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刊 总第十期



2014.3

目录

Contents

研究与探索

- | | | |
|----|---------------------------------------|-----|
| 4 | 1947：宋庆龄遭遇恶意诽谤 | 郑培燕 |
| 9 | 普希金纪念像的磨难与重生 | 王宁宁 |
| 17 |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众化、具象化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报告 | 傅 强 |

宣教论坛

- | | | |
|----|----------------------------|-----|
| 21 | 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
实践与思考 | 仲灵颖 |
| 24 | 浅议新媒体与纪念馆宣教工作 | 傅 强 |

陈展天地

- | | | |
|----|-----------|-----|
| 30 | 参观南京博物院有感 | 花婆婆 |
|----|-----------|-----|

馆藏研究

- | | | |
|----|--------------|-----|
| 36 | 宋庆龄卧室里的一块镇绷石 | 宫洁菁 |
| 40 | 宋庆龄保存的一张“证书” | 麦灵芝 |
| 46 | 霍赫洛玛彩绘盖罐 | 高海涛 |

文保之道

- 50 玻璃藏品复制解述 王克华
54 浅谈故居香樟树煤污病的防治 徐世伟

馆建工作

- 56 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积极谋划 2014 年工作 金晓春
58 电子商务在纪念品销售过程中的初体验 许毅捷

藏书选译

- 60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选译（连载） 宫洁菁

资讯快车

- 70 故居新闻

图版

宋庆龄收藏的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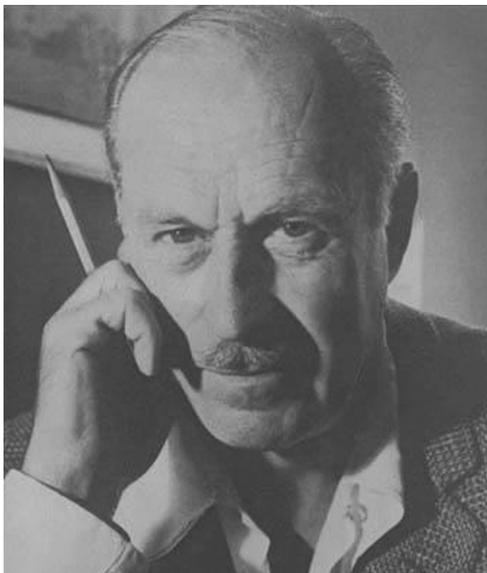
1947：宋庆龄遭遇恶意诽谤

撰文 / 郑培燕

宋庆龄，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的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战争的灾难、民族的危亡，还有来自政敌们无数次对她私人生活的谣言和诽谤。宋庆龄性格内向，面对无耻谰言，她总是感到十分痛心和难过，但是也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她的内向中时时透露着自信、从容、沉稳，总是坚强地与敌人斗争，对谣言予以坚决的驳斥。

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1947年12月9日，美国著名专栏记者德鲁·皮尔逊在他的报业辛迪加专栏《华盛顿旋转木马》上，以《中国政府隐瞒伟大爱情故事》为题，报道了关于宋庆龄的一则桃色新闻。在报道中，皮尔逊写道：“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隐瞒了自英国王储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迎娶沃丽斯·辛普森夫人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的遗孀孙夫人与来自巴尔的摩的美军上尉杰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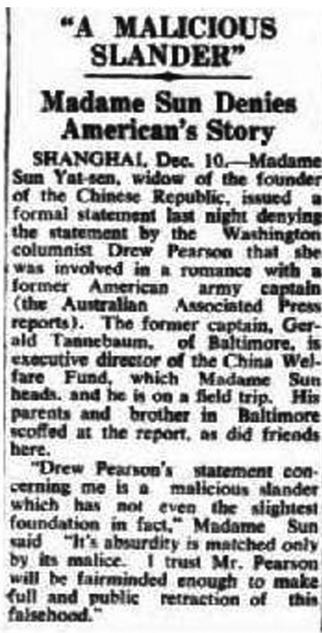
▲ 美国专栏记者德鲁·皮尔逊

德·谭宁邦的风流韵事。”在皮尔逊的笔下，年轻的来自巴尔的摩的前美军上尉杰拉德·谭宁邦在重庆为美军服役期间与55岁的宋庆龄相识，“由于他们政治观点相近，开始建立了知性友谊，后逐渐发展为温暖的爱情，以充满柔情的字条互诉衷肠。”皮尔逊的报道颇具戏剧色彩，称战后宋庆龄追随谭宁邦到上



▲ 国外媒体转发的皮尔逊的报道

海，继续保持联系并以唱片传情。他是这样写的：“战后，谭宁邦被调到上海，孙夫人跟随着他。他继续写情书，亲密地称她为‘苏西’。这些信被一个中国信使密存在一个国民党的监视者检查不到的地方。孙夫人被盯得太紧的时候，她就送流行爱情歌曲的唱片到谭宁邦位于当时美国人接管的上海美商华美广播电台的办公室里。他便回到控制室秘密地播放这些唱片。有时她也能接通电话，遇到这样的情况，谭宁邦便会让他的职员离开。但是他向几个信得过的朋友透露他想同孙夫人结婚。”在皮尔逊笔下，“孙夫人极其谨慎，在一起出席的公开场合特别留心避开谭宁邦。但是当他要从军队退役回美国的时候，她做



▲ 国外媒体转发的宋庆龄声明

出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她雇佣他去领导一个她所创立的小型救济组织。”皮尔逊还报道说，这桩风流韵事之所以会曝光，是因为孙夫人一贯倡导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相处，因而被认为是家族中的另类，有人甚至把她看作是共产党，因此她被长期严密监视，从而她的信件被截获，这桩风流韵事因此被发现。但是，“三年来这件事一直是中国保守得最严实的秘密”，因为“孙夫人堪比当代中国的玛莎·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夫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尊敬她。她的家庭以及与她有关联的一切已经被中国人民奉若神明。因此，她与一位外国大兵相恋的新闻将令中国舆论界一片哗然。”皮尔逊称由于“孙

夫人有很高威望，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她坏话。相反，政府像保护一个活的民族纪念碑一样保护她”。“中国政府为此事大伤脑筋，当谭宁邦因为兄弟快要离世而返回美国的家乡以后，中国政府曾经做过种种努力阻挠他回到中国，但是没有成功。”不久，“他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中国最受崇拜的女士身边。”

皮尔逊的报道一出，各大报纸争相转载。一时间，关于宋庆龄的这则绯闻传遍了全世界。

一种“恶意的诽谤”

在1947年12月9日发出这篇关于宋庆龄的专栏报道时，皮尔逊的《华盛顿旋转木马》已经离开“联合报业”辛迪加，处于“贝尔”辛迪加时期。这篇报道的风格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手法，除了说“孙夫人一直以来被视为家族的异类，长期倡导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相处，友人甚至认为她是共产党，因而被长期监视”是符合事实的以外，其余的关于宋庆龄与谭宁邦日久生情，互写情书，甚至以唱片传情等一些细节都是歪曲捏造的谎言。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从重庆迁往上海，继续从事救济及福利工作。宋庆龄争取一些同情中国的美国人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谭宁邦便是其中之一。谭宁邦全名为杰拉德·坦纳鲍姆，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市，原来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广播演员，

战时在美国陆军中任上尉，1945年被选为军队无线电台成员到中国重庆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工作，同时担任被美国接管，为美军导航的上海美商华美（又称西华美）广播电台指挥官。1946年谭宁邦在中国从美军退役，加入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公关部当记者，同年7月1日加入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总干事。宋庆龄1946年7月1日自上海致纽约的好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向格雷斯解释了决定任命谭宁邦任总干事的原因之一，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曾同另一个同类组织“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谈判过，“由谭宁邦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他们负担”。然而，在皮尔逊的报道中，宋庆龄请谭宁邦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成了她为达到与谭宁邦继续在一起的目的而采取的策略，从事救济事业变成了满足她个人私欲的手段。

皮尔逊的报道一出，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宋庆龄很快了解了这一情况，她立即于1947年12月10日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对皮尔逊的报道进行强烈谴责。声明说：“德鲁·皮尔逊关于我的说法是一种恶意的诽谤，毫无事实根据。它的荒谬同它的恶意可以等量齐观。我相信，皮尔逊先生将有足够的公允之心，全面地、公开地撤销这一不实之辞。”

熟悉和了解宋庆龄的朋友都知道，这则新闻报道的背后，是一场恶意的政治阴谋。

人身攻击背后的政治阴谋

与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垮台以后宋庆龄远走莫斯科，关于她要与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满天飞一样，每当宋庆龄公开表示坚决的立场，她的敌人总会像过去做过的那样，互相呼应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

1946年，内战的乌云笼罩着中国，而美国政府以武力援助国民党，力图阻止或限制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形势愈发险恶，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内战危险中。此时的宋庆龄在上海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战后救济事业，同时，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形势。

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打破多年的沉默，跨越救济工作领域，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对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她的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国内各行各业纷纷响应。彭泽民、何香凝、丘哲、张文、李章达等44人联名通电，呼吁内求和平，外伸正义，立即停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美国前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谈话，美国一些报刊发表社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

虽然宋庆龄强调“在声明的发布中，绝无任何偏向”^[1]，但是她的声明还是被许多美国媒体认为是具有强烈的亲共色彩^[2]，于是，她的政敌们又开始了一

场抹黑她的运动，制造各种新闻，企图诋毁她的形象。正如1946年11月，原供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后转入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美国人西尔维亚·坎贝尔从上海写回美国的家信中说，“在这里，也在美国，肯定在进行一场把她抹黑的运动。”“我们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有人）正在美国进行着一场政治迫害。”^[3]至1947年底，皮尔逊炮制宋庆龄桃色新闻使得对宋庆龄的人身攻击达到极致，虽然皮尔逊的报道中没有明确说明他的消息来源，但他在报道中说孙夫人的风流韵事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她的长期监视和截获的信件而曝光的，因此，包括西尔维亚在内的很多熟悉和了解宋庆龄的国内外友人都认为这个谣言是国民党制造出来，专门向国外散播的。曾经担任过宋庆龄贴身保镖的台湾共产党员蔡仲伯也认为这是卑鄙的人身攻击。他所认识的宋庆龄为人“很低调，虽曾留学美国，但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礼教”，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国民党制造这样的桃色新闻，既可以把宋庆龄抹黑，又可以破坏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筹款活动。

对于这样恶毒的人身攻击，宋庆龄无疑愤怒不已，也十分痛心。但是，对这些“下流的攻击”，宋庆龄表示“并不为此担忧”^[4]。正如有些外国报刊所评论的那样，宋庆龄“虽然娇小，纤弱，漂亮精致，谦逊地几近羞怯，但她却有着热烈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她没有



▲ 宋庆龄（二排右三）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居中者为谭宁邦。

被这些流言所击倒，而是沉着、冷静，从容面对。宋庆龄深知“如果就此事对皮尔逊提起诉讼不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因为对方总会想方设法进行抵赖。而且将此事公开地搞得满城风雨，到头来会对自己造成更大伤害。”^[5]但是，她也“决不会向敌人屈服，而使他们失望的。”^[6]她公开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皮尔逊的恶意诽谤。宋庆龄的声明通过美联社发出以后，全球各大报纸均全文转载。而据相关媒体报道，谭宁邦远在巴尔的摩的父母和兄弟对皮尔逊的报道嗤之以鼻，他在纽约的朋友也是如此。事实上谭宁邦在解放前的恋爱对象是陈元琪小姐，上海解放后两人就结了婚。陈元琪的姐姐陈元珍是陈友仁之子陈依范的夫人。国内外有识之士都看得出这是一支射向宋庆龄的政治暗箭，谣言不攻自破，国民党抹黑宋庆龄的阴谋又一次落空。

正如西尔维娅所说的那样，宋庆龄的政治敌人那么多，对她人身攻击的狂潮不会那么快过去。1949年初，国民党

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又采用同样卑劣的手段，散布谣言，说国民政府将邀请宋庆龄出任政府首脑，并称宋庆龄已收到这一请求并可能接受。这一谣言甚至传进了美国国务院。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又一次展现了她的从容与坚定，她以其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公开发表辟谣声明。纵观宋庆龄的一生，面对人身攻击和恶意诽谤，虽然她曾受到强烈打击甚至病倒，但是最终她总是能够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告知世人，打破谣言，展现她独特的强大精神力量。

历史已经证明了宋庆龄的高洁，造谣者如跳梁小丑般的行为终究会被雨打风吹去。回望历史，可以说“清者自清”是对这一“绯闻”最好的注解。



[1]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3] 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页。

[4]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5][6] 宋庆龄1947年12月19日致爱泼斯坦信，《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普希金纪念像的磨难与重生

撰文 / 王宁宁



▲ 上：普希金纪念像第二次树立
下：宋庆龄参加雕像揭幕活动

“普希金纪念像在上海重新树立

昨天 400 多人参加了著名俄国诗人普希金新铜像在岳阳路（原祁齐路）的揭幕仪式。

这是普希金的纪念像第二次在上海树立，以前的铜像在日军侵华时损毁。

这位著名诗人的胸像（上图）最近

从莫斯科一家艺术画廊中运来，共花费大约 500 美元，由本地的苏联市民捐赠。

参加落成仪式的有吴国祯市长，孙逸仙夫人，塔斯通讯社驻本地机构主席 N·罗果夫先生，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其他社会人士。”^[1]

1947 年 10 月 29 日上海《自由论坛报》的这篇报道将普希金纪念像推到笔者的面前。这座上海著名的纪念像曾经历两毁三立，历经坎坷，其间过程也因历史久远模糊不清。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希望可以给公众还原这座历史雕像的前世今生。

1937 年普希金纪念像首次树立

1937 年是俄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逝世 100 周年，当时国内一些大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例如在南京，2 月 10 日中苏文化协会在新都大戏院举行纪念会，各界来宾有一千余人出席，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张西曼在会上致辞，并放映了普希金的名著

《复仇艳遇 (Du brovsky)》影片^[2]。上海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早在1936年便成立了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并决定树立普希金铜像。据江椿芳先生回忆，这个纪念委员会委员有蔡元培、法国总领事、苏联总领事，以及上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3]。1937年2月10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大戏院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苏联方面邀请上海文化届和各界知名人士出席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出席了纪念会，宋庆龄亦出席此会，并成为头号贵宾。会上苏联演员和中国演员表演了音乐节目，音乐家冼星海和任光等都参加了组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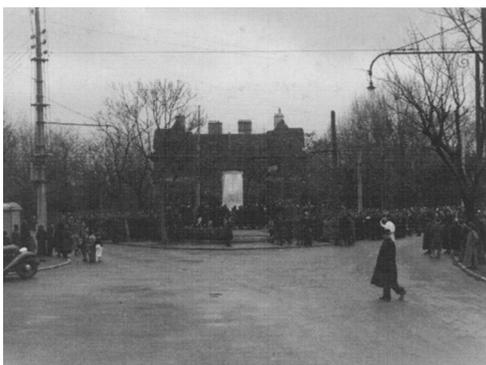
树立普希金纪念像是普希金百年纪念活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座纪念碑虽是为纪念俄国伟大诗人而设，在当时却主要是由法租界当局赞助完成的。首先纪念碑的地点设立在祁齐路（今岳阳路）和毕勋路（今汾阳路）口，是属于法租界管辖的；其次，这座纪念像揭幕仪式的很多环节都是由法租界的全力配合才得以完成。纪念碑的费用并不是在人数众多的苏联侨民的各阶层中征募而来的，它是仅靠了几个人的资金援助。那时上海的苏联侨民并不觉得自身是同一整体，对筹款活动并不积极。可以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由全体俄国侨民建立的，而只是由组成修建普希金纪念碑委员会的一小群人建立的。

在向外征集纪念碑的铜像制作时，当时仅有两个艺术家参与评选，波德古尔斯基和凯时古恩，纪念碑的台基部分，也仅有两个建筑师，格朗和赖文参与竞赛。最终，波德古尔斯基胜出为普希金纪念碑制作胸像但是据他回忆，他一共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以吉普兰斯基所作的著名画像和雕刻家陀莫迦茨基所作的普希金胸像的照片为蓝本创作铜像。^[4]格朗的纪念碑台基图样中选通过，并照此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是三面的，正面半圆形的基座上用俄文刻写“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先生逝世百年纪念碑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上面放有普希金胸像。纪念碑的另外两面则是分别用法语和中文重复正面的刻字。^[5]

2月11日上午11点半，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纪念碑落成仪式在法租界祁齐路、



▲ 波德古尔斯基所作的普希金半身像



▲ 揭幕前的祈齐路、毕勋路三角广场全景



▲ 索克尔小姐为纪念碑揭幕



▲ 约翰主教为纪念碑举行宗教仪式



▲ 揭幕后的普希金纪念碑

毕勋路口举行。在 11 点半之前，就有很多外国官员抵达，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席查尔斯·麦特兹勒先生亲自迎接。揭幕礼上，查尔斯首先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词，表达了苏联团体对中国人民和法国侨民的感谢，并指出了普希金的天才作品对苏联人民的伟大意义。然后法国驻沪总领事鲍德兹先生的继女索克尔小姐为纪念碑揭幕。亨利路俄国东正教堂的约翰主教主持了一个简短的宗教仪式，其中唱诗班用俄语演唱了赞美诗，由法租界巡捕房乐队伴奏，而后约翰主教为来宾们祷告，宗教仪式部分

就此结束。接着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的副主席莱曼斯基教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重申苏联侨民对中国和外国官员友善的感谢。最后，一群苏联小朋友列队在纪念碑前走过，整个仪式结束。^[6] 这次活动主要以苏联和法国侨民为主。当天晚上 9 点，在环龙路 11 号法租界公董局礼堂也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一些外国重要人士在活动上发表了演说。这些都是上海普希金纪念活动简要的一览。

1937 年 2 月 11 日树立的这尊普希金纪念像，是亚洲的第一座诗人纪念像。

1937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全面进攻中国，普希金铜像于1944年11月被拆除熔制军火^[7]，只留有一个空虚的台座。



▲ 被日军盗去铜像后的普希金纪念碑

1947年普希金纪念像第二次树立

1946年11月14日，有“一群苏联公民”写信给《新生活日报》编辑部，提出重建普希金纪念碑的倡议，并号召该报社集募重建基金，同日，上海苏联侨民协会理事会，也致信给《新生活日报》总编辑顾利士，提出了同样的呼吁。11月17日，由《新生活日报》通知各文化与社会团体以及个别的人士之后，就组织了一个“重建普希金纪念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简称为“普希金委员会”。该会选举罗果夫为主席，顾利士为秘书，全委员会共22人。普希金委员会原计划于1947年2月10日即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重新建立纪念碑。

罗果夫曾为此事专门致信上海市长吴国桢，以求支持，并希望他对相关媒体发表讲话表示赞同。吴国桢因此在和《新生活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这样表示道：

“在上海重建贵国大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我自己也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的一些翻译。这位大诗人的真诚和对自由的挚爱，曾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谨祝你们在重建日寇所毁的俄国大诗人的纪念碑的这件重大的文化事业上获得全部成功。”^[8]不只如此，吴国桢同时还令工务局给予配合。具体负责该工作的是工务局第三区工务管理处，该处处长郑德奎在接到指令后，就确认是否仍在东平路口原建之三角广场复原此像而亲往外滩26号找罗果夫洽谈，但因罗果夫不在而无果。到1947年1月时，该广场还无动工迹象，因受制于经费，此时纪念像仍在筹备时期，已赶不及2月10日揭幕。1947年3月27日，罗果夫才致信郑德奎处长，希望他配合重建工作在普希金纪念碑广场补植小树，更换草皮及平整路面，得到了积极的配合。^[9]

在普希金委员会组成之后，征募重建纪念碑的基金的运动随之进行。为了这个目的，普希金委员会在兰心大戏院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文艺音乐晚会进行筹资。^[10]1947年是普希金逝世110周年，2月8日，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联合全国文艺，戏剧，音乐，木刻协会等7个文化团体，在上海光华大戏院举行了

一个盛大的纪念会，参加者多达 2000 多人。这次纪念会集资法币一百万元，全部捐献给普希金委员会。该款由普希金委员会常务理事兼上海分会主任秘书葛一虹亲交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上海代表克留可夫转送，普希金委员会之主席罗果夫及秘书顾利士两人为此事专门向中苏文化协会致谢^[11]。可以说，募集资金的号召，在各方面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在四五个月中间，靠志愿捐款方法就集齐了重建纪念碑所必须的费用。捐款人士的姓名，都刊载在《新生活日报》及《俄文日报》两种报纸上。其中除掉很小一部分是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捐赠之外，这一次重建普希金纪念碑的基金基本是由全上海的苏联侨民集募起来的。征募基金的盛大成功，使得普希金委员会有可能向莫斯科订购苏联著名雕塑家符拉其米尔·尼克拉耶维奇·陀莫迦茨基（1876-1939）所作的铜像。^[12]

陀莫迦茨基的普希金胸像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以形象的纯朴性、高贵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动人。^[13]上海所购买的普希金铜质半身胸像呈紫黑色^[14]，在 8 月 10 日运抵上海，10 月 16 日委员会方才接到，而后陈列在俄文《新生活》报馆编辑部^[15]。在普希金委员会下设的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建筑师彼得罗夫、艺术家阿拉斯泰谢夫及马哈拉哉等人开始了改造纪念碑台座的工程。^[16]改造后，正面半圆形基座被圆柱形基座取代，上面做了一个石质花盆，纪念碑三



▲ 陀莫迦茨基所作的普希金胸像

面都削去了一角，变为内弧形，半身胸像被放置三角形纪念碑正面的顶端。普希金委员会还做了其他一些工作，如征求纪念碑揭幕典礼时用的《普希金大合唱》的歌词和中国画家所作的普希金画像。当时获奖的有沈同衡所作的墨笔画的普希金像和戎戈及刃锋两人所作的木刻画像。他们都是当时中国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1947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岳阳路汾阳路口隆重举行了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广场上花束和花篮琳琅满目，苏联驻沪总领事馆，中国作家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上海诗人和作曲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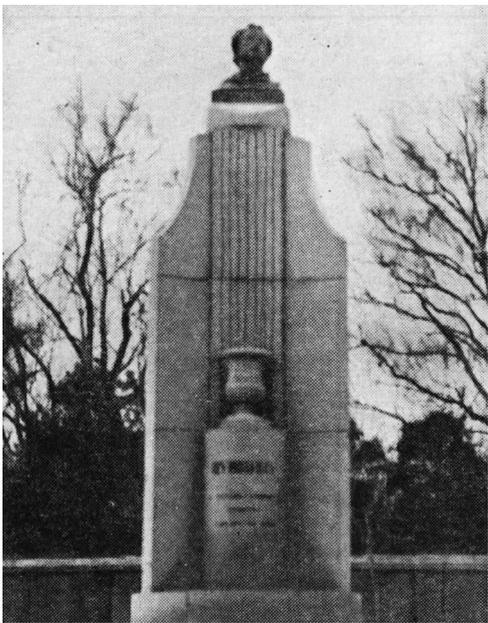
俄文《新生活日报》和《时代》杂志社都赠送了花篮。

揭幕礼预定于 11 时举行，前来参加观摩的群众很多。出席参加揭幕典礼的重要嘉宾有：苏联驻沪总领事哈林夫妇，副领事契尔诺涅波夫，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克留科夫，苏联驻华大使馆副军事参赞梅德维杰夫上尉，上海市长吴国桢，孙逸仙的夫人宋庆龄，鲁迅夫人许广平，上海侨民协会主席比尔勃拉耶尔，中苏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苏两国文化界代表等。先由普希金委员会主席、塔斯通讯社驻本地机构主席罗果夫致开幕词。他在开幕式上说：“今天是全体苏维埃人民的重大节日，我们应该向市长吴国桢先生致谢，因为他对纪念像重建工作的进行给予很大的赞助。普希金委员会今天以这揭幕典礼来将纪念像献给上海市，作为苏维埃人献给伟大中国人民的文化礼物。”^[17]随后市长吴国桢博士踏上纪念像台脚，拉下幕帷，露出了伟大诗人的胸像。揭幕之后，吴市长发表演说，对苏联公民重建纪念像表示感谢。之后，苏联驻沪总领事哈林也发表贺词。典礼于是完成。直到晚上，还有一些白天不能参加典礼的上海人源源不断地到岳阳路汾阳路口去瞻仰纪念像。^[18]

1967 年，普希金铜像在“文革”肆虐中再一次被毁，铜像被人拖走，这一次甚至连碑体也未能幸免。



▲ 苏联驻沪总领事哈林在举行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时发表演说。左首是上海市长吴国桢，右首是普希金纪念委员会主席罗果夫及委员会书记库列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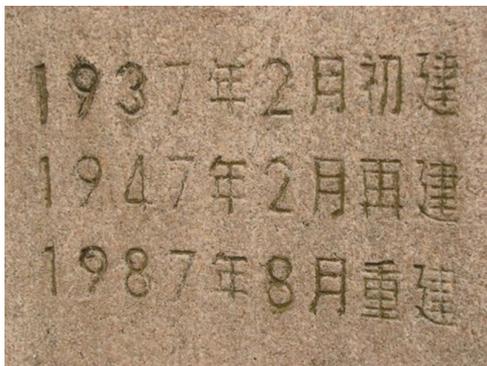
▲ 1947 年再建的普希金纪念碑

1987年普希金纪念像第三次树立

改革开放后，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为推动各省市的城雕建设，拨出一部分经费给一些省市作补贴，上海得到了5万元。上海市城市雕塑委员会决定用这笔经费来重建普希金纪念碑，上海市园林局主动承担重建经费的缺口部分。^[19]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教师齐子春、高云龙两位雕塑家负责创作普希金像。当时创作普希金铜像的惟一依据是一张很小的旧照片，模模糊糊的，而且只有一个侧面，雕塑家凭着对普希金铜像的感受创作出了第三座普希金铜像。新建碑身的高度，也是从照片上的碑身与人物的比例关系来推断的。1987年8月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时候，普希金铜像第三次在原址落成。普希金铜像坐北面南，安置在高约4.2米的基座顶上，半身铜像0.9米。^[20]纪念碑系米色花岗石砌筑，呈三面内弧型，底部正面凸出半圆，以中文镌刻：“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纪念碑，1799～1837年”；顶端砌半圆石质花盆；左侧碑座用俄文书写普希金出生、逝世年月；右侧碑座中文刻写重建历史：“1937年2月初建；1947年2月再建（应为1947年10月再建），1987年8月重建”。纪念碑外沿建花岗石三级台阶，并用块石铺圆形地坪，边砌高约半米3个石质椭圆形桶。其外3个绿化小花圃，外围矮铁栏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解冻，故落成时未举行任何仪式。



▲ 今天的普希金纪念碑



▲ 普希金纪念碑上镌刻的重建历史

普希金纪念像经历两毁三立，可谓历经磨难与重生。它既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坎坷历程，更成为精神不灭的象征。宋庆龄参与了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活动，

还参加了普希金纪念像的第二次树立，笔者认为不是偶然的，而是她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选择。在上海故居，宋庆龄还藏有《普希金文集》、《普希金诗集》、《普希金的诗、戏剧和散文》等普希金著作。这些珍藏的书籍见证了宋庆龄对普希金的喜爱，反映了宋庆龄当时的文学品位及思想倾向，说明她对普希金怀有真诚的敬佩之情，对普希金的精神有很强的认同感。普希金与宋庆龄虽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抱有相同的理念，那就是对自由的捍卫、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光明必能战胜黑暗，理智必能战胜偏见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一直支持着宋庆龄，让她与新中国一起迎接解放，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 [1]《普希金纪念像在上海重新树立》，《自由论坛报》1947年10月29日，第1版。
[2]《中苏文化协会纪念诗人普希金》，《中央日报》，1937年2月10日，第4版。
[3]江椿芳，《回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8年第2期。
[4][7][8][10][12][16]罗果夫主编：

《普希金文集》，时代书报出版社1947年版，第389页，第384页，第388页，第389页，第389页，第389页。

- [5]《纪念碑今天揭幕》，《大陆报》，1937年2月11日，第1版。
[6]《本地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北华捷报》，1937年2月17日，第282页。
[9]《上海市工务局筹建总理铜像、普希金纪念碑和拆除丧钟塔文书》，上海档案馆，档案号：Q215-1-3721。
[11]《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中苏文化》，1947年第3期。
[13]《普希金胸像作者陀莫迦茨基》，《时代》，1947年第42期。
[14]《普希金铜像重建》，《智慧》，1948年第40期。
[15]《普希金胸像作者陀莫迦茨基》，《时代》，1947年第42期。
[17][18]《上海普希金纪念像揭幕》，《时代》，1948年第2期。
[19]《普希金之路》，<http://trueaaron.blog.163.com/blog/static/10535983200821894056475/?hasChannelAdminPriv=true>
[20]《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96页。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众化、具象化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报告

撰文 / 傅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既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具象化教育活动的主力军。近年来，上海的各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宣传教育的通俗化、具象化、大众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重点在大众化，难点也在大众化。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就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大众认知理解、认同内化并最终被实践外化。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我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具象化。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这一抽象概括的科学理论渗透到典型事例、影视作品、文学艺术、时代楷模、公益广告、人文景观、物化环境、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形象具体的载体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由抽象概括的理论逻辑转化为生动、形象、具体的生活逻辑。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是传播大众化、具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阵地之一。每一座遗址、每一个展馆、每一件文物，它们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故事。无论这些故事讲述的是红色印记还是伟人风范，是申城文脉还是浦江英魂，蕴含在这些故事中的，正是具象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资源，以生动具体的故事、事例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能够巧妙地把传播目的、动机和观点溶化、隐藏于人们喜闻乐见的载体中，因此它可以使受传者在愉悦的艺术享受和强烈的情感共鸣中，不知不觉受到传播内容的感染，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大众认知和认同。

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具象化教育活动现状分析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手段就是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用具象化的形式来展现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些活动中耳濡目染、心领神会，从而逐步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截止到今年，上海的86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以各种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具象化教育活动的已超过82家，占教育基地总数的95%。其主要传播方式有以下几种：

1、以“三巡六进”创新载体的宣教形式，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

目前，上海各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泛开展的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三巡六进”。所谓“三巡六进”，即巡展、巡演、宣讲，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村镇、进军营。据统计，

2012—2013年度，本市开展“三巡六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有69家，占到教育基地总数的80%以上。

“三巡六进”是当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它将有限的展览空间不断拓展，使教育活动向纵深发展，也使得教育活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真正实现教育活动的大众化。

2、以分众设计、重点针对的活动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

“三巡六进”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大众化”的层面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而“具象化”则对传播的方式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时候，宣传教育的效果不佳并非是我们说的内容不好，而是说的方式落后于时代。要实现教育活动的效果最大化，就有必要对受众进行分析，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进行分众化地精心设计，用受众最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最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最形象生动的语言载体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力求让受众能够听明白、记得住、用得上。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以“线上线下”立体覆盖的传播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力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扩张和发展，正渐渐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言,既是全新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新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的途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宣传教育方式也日益呈现多渠道、多载体。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说,新媒体为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更快捷、更有效的平台,如何利用好这个平台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宋庆龄陵园、孙中山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具象化教育活动的建议

1、进一步细分受众,设计开发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

“大众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必然要求对受众进行细分。“大众”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教育水平的大众,其思维方式、情绪情感、注意力、感知能力、接受能力、兴趣点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同样一个活动,可能小学生非常喜欢,但高中生就会觉得幼稚;同样一个讲座,给老年人讲效果很好,但是给青少年讲可能他们就没法接受、理解。

因此,现代传播学越来越强调对受众进行细分,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和接受能力来“定制”相应的宣传产品。从此次调研数据来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各类活动中,有特定受众的、有针对性的活动,其宣传效果明显更好,观

众满意度明显更高。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教育活动首先应该充分考虑受众的特点,分析受众的需求,然后针对某一受众群体来策划教育活动,切忌“一视同仁”。例如针对青少年,教育活动应注意寓教于乐,借鉴“夺宝奇兵”、“奇妙之旅”等形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培养价值观;针对成年人,则应在生动性和通俗性上下功夫,多讲故事,少讲道理,用最真实、感人的事例引起他们的共鸣;针对老年群体,教育活动的形式可以更加活泼多样,不妨结合本馆资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歌曲、戏剧、情景剧等艺术形式展示出来,让他们在观赏的同时有所体悟。

2、挖掘文物故事,具体、形象、通俗地传播核心价值观

“具象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理念以最为具体、形象、通俗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说,讲述文物展品及其背后的故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文物和展品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文物的功能不仅是简单的印证历史,文物还以其形象、生动、直观的特点最能感动人,最能有效地昭示历史的真理及其所蕴藏的伟大精神力量,起到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革

命文物是革命精神的物化载体，作为思想教育、传播知识的一种手段，具有真实性和形象性的特点，是其他宣传教育手段所不能代替的。”直观、形象、生动这些特点使得文物展品能够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具象化教育活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从教育效果的角度来说，“讲故事”的方式相较于概括式、结论式的讲解也更受观众的欢迎。例如，青少年群体处于成长发育期，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都很强，但由于逆反心理的作用，枯燥的说教不仅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甚至往往会适得其反，要吸引青少年的兴趣，就必须多讲故事、少摆道理。成年观众同样对文物故事更感兴趣，他们的参观往往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受教育并非其主要目的，他们对概括式、结论式的讲解最为反感。他们更希望了解的是历史的细节和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更为可信，他们不需要讲解员将结论告知自己，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缝衔接”于生动感人的文物故事中，那么，参观和听讲的过程就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统一了起来，文物故事越生动，核心价值观也就越具象。

因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更加重视深入挖掘文物展品背后的故事，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这些文物背后的

故事进行提炼和加工，从而充实讲解内容，提升教育功能。

3、开展交流合作，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宣教精品项目

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如今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设计开发了自己的宣教精品项目，这些项目形式、内容各不相同，或讲或唱、或演或颂、或展或播，都是以形象生动、雅俗共赏的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地展示给观众，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项目应大力宣传推广，提高知晓率，增加参与度，并适当给予人力、财力的支持，让好活动真正收到好效果。笔者还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创造平台，将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精品宣教项目进行精选、编排，以汇演、巡展的形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公开展示，配合相关宣传，形成规模效应，扩大影响力，让更多市民群众接受教育、接受熏陶。

同时，相关部门还可以组织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交流互动，邀请优秀教育项目的设计者进行案例讲解和经验介绍，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深度分析和专业点评，积极推广教育基地在大众化、具象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有益做法，并在学先进、学经验的过程中鼓励各教育基地大胆创新、勇于尝试，为上海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助力。

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以“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活动为例

撰文 / 仲灵颖

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中，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最基本的教育。博物馆、纪念馆历来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载体和重要阵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作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尤其在开展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创新与实践。笔者以本馆开展的“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活动为例，谈谈在开展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的一些思考。

一、我馆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情况分析

对于成年人来说，理解我馆陈列展览的内容并不困难，不过对于大多数思维能力、接受能力尚未成熟、完善的未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他们的参观往往比较被动，注意力也不够集中，一般较难找到兴趣点。针对这一情况，我馆近两年来经过探索和研究开展了不少针对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积累了不少经验。

例如“故居寻宝之旅”活动。该活动为未成年人设计了一条参观路线，让他们按图索骥，主动在展厅中寻找一些造型别致或者是有着特别意义的文物，然后用答题的形式完成整个参观过程。活动充分激发了未成年人的参观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宋庆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中不足的是形式上较为单一、不够创新，只停留在“做题目”的阶段，而且答题内容也较为简单，不能有效地吸引高年龄段的未成年人。

再比如“为故居增色 为梦想添彩”少儿填图活动。该活动选取了故居最具代表性的主楼建筑、香樟树和鸽子作为素材，制作成具有故居特色的填图卡。未成年人在参观结束后，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图样，根据想象力涂上颜色或创作图画，加深他们的参观印象。活动吸引了许多低年龄的孩子，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玩得不亦乐乎，不过该活动也有所欠缺，在参观时难以帮助未成年人去理解展览内容。

这些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很快引发了

我们的思考,在不断研究、改进的基础上,我馆推出了“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活动。

二、“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活动概述

“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活动是2013年入选上海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优秀项目的“宋庆龄故居奇妙之旅——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未成年人参观实践项目”中的主要活动之一。该活动主要针对前来参观的小学阶段(6—11岁)的未成年人,以游戏活动本的形式,让未成年人与家长一起在参观中完成“寻宝”、“找茬”、“连连看”、“填色”、“折纸”等一系列游戏,既有合作任务,又有竞争环节,趣味十足,全部完成后可领取纪念品或盖章留念。该活动旨在通过生动的参观导览、趣味亲子游戏,让未成年人与家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参观纪念馆,增进彼此间的情感交流,并对宋庆龄有所了解,学习伟人的高尚品格。活动主要传递的是宋庆龄对家的依恋和对亲人的感情,由此上升到宋庆龄的爱国情怀,意在培养未成年人的家庭意识、爱国精神以及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

本活动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众多未成年人及家长的热烈欢迎,自2013年7月开展至今,已有2500余户未成年人家庭,近8000人参与了此项活动。经过参与者的口口相传,不少未成年人家庭都慕名而来,节假日期间故居的展厅中

四处可见拿着手册、拉着家长认真“寻宝”、找答案的未成年人,无论孩子还是家长都乐在其中,好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活动手册中对于宋庆龄在家里热情接待国内外来宾、重视亲情、热爱儿童的描述,也让这些未成年人在游戏中接受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思考

1、明确对象、找准主题

明确活动对象、找准活动主题对于活动的策划和开展来说十分重要。明确活动对象后,再根据他们的特点,确定活动主题,并有针对性地挖掘自身资源来策划、设计活动,这样便能较好地提升活动效果。也许有人会问:“活动对象很明确,不就是未成年人吗?”其实,未成年人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也就是说,6岁的孩子属于未成年人,16岁的孩子也属于未成年人,但是这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兴趣爱好等各方面都无可非议地存在差异,正如之前提到的“故居寻宝之旅”活动,6岁的孩子很感兴趣,但16岁的孩子却会感觉有些幼稚。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时,我们有必要将未成年人做进一步细分,以明确活动对象。在我馆未成年人参观实践中,我们将前来参观的未成年

人大致按照小学阶段（6—11岁）、初中阶段（12—15岁）、高中阶段（16—17岁）这三个年龄段来划分，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分众化设计新颖有趣的参观实践活动，以改变未成年人普遍认为参观名人故居无趣无味无聊的现状，让参观变得好玩，让教育变得有趣。如上文所述，此次活动的对象选定为前来参观的小学阶段的未成年人，那么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参观时有什么特点呢？什么样的活动主题适合他们？据观察，6—11岁的未成年人大多是在家长的带领和陪伴下前来参观的，他们对于展览内容的理解有一定难度，而且大多活泼好动，注意力分散，时常被家长“拖着走”，与家长缺乏沟通和互动，鉴于这些特点，我们便确定了以“家”为内容的“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活动这项主题，意在让未成年人在参观时和家长一起“主动”地去了解展览内容，增加亲子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培养他们的家庭意识、爱国精神，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2、勇于创新、寓教于乐

想要达到良好的活动效果和教育目的，改变未成年人对参观名人故居无趣无味无聊的印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的创新性和趣味性必不可少。在这个求新求变、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未成年人可看可玩的东西层出不穷，要想提升我馆活动的吸引力，创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或缺的；再者，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走出应试教育的课堂来到名人故

居这个“社会课堂”里，轻松生动、趣味性强的教育活动往往更能引起他们参与的兴趣，那些带着浓重的“教育”色彩的活动内容，反而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一丝反感。“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活动之所以能受到未成年人的普遍欢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活动创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更加强调互动性和趣味性，打造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吸引未成年人主动参与的教育活动。活动根据6—11岁未成年人以具象思维为主、好动活泼的特点，加入了许多游戏的形式，将原本对未成年人来说有些枯燥无味的参观变成了趣味十足的亲子游戏，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例如在参观中要求未成年人与家长合作根据文字描述寻宝贴纸、在故居中根据房间的照片与家长竞赛找茬、在家长的帮助下寻找连连看的答案、与家长一起涂色折纸做手工等，在这些游戏中，家长和孩子或合作或竞争，摆脱了原本单一“做题目”的形式，内容上也由易到难逐步提升，让未成年人在娱乐中了解伟人及她所做的贡献，学习“爱家”和“爱国”，同时家长们通过活动充分地与孩子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也实现了活动的目的。

以上几点是笔者在开展我馆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总结的一些粗浅的想法，许多不完善之处仍然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来发现、改进，力求进一步提升我馆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品质和效果。

浅议新媒体与纪念馆宣教工作

撰文 / 傅强

何为新媒体？虽然新媒体是时下最为热门的概念之一，但是对新媒体的定义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新媒体是“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也有人认为，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当然，也有人明确指出，所谓“新”媒体，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我们说的“新”媒体是相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但是，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日益飞速发展，当今时代的“新”媒体，也许有朝一日会被更新的媒体所取代。尽管如此，对下面的定义大多数人是认可的，即新媒体是指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利用计算机处理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无线技术、通信技术、卫星技术等手段，通过手机、电脑、数字化电视等终端工具，向受众提供讯息和娱乐的一种新型的传播模式和媒体形式。

从2009年开始，随着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激增，新媒体在中国进入快速发展

时代，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为4.29亿人，2012年底，这一数字已超过5亿。2009年，新浪微博正式推出，2011年，中国微博用户达2.498亿，2012年，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总数已达到了5.03亿，而微信更呈异军突起之势，从2011年1月21日发布第一个微信版本，到2013年1月15日晚，腾讯微信达到3亿用户，耗时不到两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第三方应用程序（APP）的应用和下载也呈井喷之势，截止2013年5月16日，苹果公司宣布其应用程序商店APP的下载总数突破了500亿次大关，这其中中国用户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毫无疑问，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传统媒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今已开始渗透和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纪念馆人来说，这也是一次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就将试图从纪念馆宣教工作的角度，就新媒体与博物馆（纪念馆）的关系、新媒体对宣教工作的影响、新媒体在宣教工作中的应用提出一些见解，

以供参考。

新媒体与博物馆（纪念馆）

2012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了一份关于“新媒体与博物馆观众参与”的报告，该报告基于对美国1224个艺术机构的在线调查。报告指出，网络与社交媒体现已渗透到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运作的方方面面（策展、展览、教育、慈善、活动等），成为美国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部分机构用其进行在线活动与展览宣传、售票、筹资、观众留言与互动等，并表示新媒体极大地提高了观众的参与度及对博物馆和藏品的理解深度。

此前，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博物馆2012年展望》中也指出，全世界博物馆在2011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iPhone手机应用程序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博物馆界专家一致认为，博物馆领域的新媒体应用还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但人们必须挖掘能够实现博物馆使命的最佳技术和战略，因为博物馆正势不可挡地驶入一个全新的虚拟互动世界。

2012年2月24日，以“博物馆与新媒体”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大同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50余家博物馆的近百名博物馆人参会，共议新媒体的发展与博物馆的未来。

2012年3月，《中国文物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博物馆：新媒体应用势不

可挡》的文章，指出：国外博物馆自上世纪末就开始新媒体应用的尝试，许多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播领域大范围引入新技术，不仅建立起了适用于不同年龄和兴趣群体的网站、四通八达的网络社交平台，还开发了多款移动设备应用程序，集知识性、互动性、娱乐性为一体，开辟了观众参与的新天地。而国内博物馆在这方面虽起步较晚，但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与新媒体技术应用已引起了博物馆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数家博物馆都在其网站上开设了“虚拟展厅”，观众足不出户即可“神游”博物馆；“微博”等新兴的社交平台更是被誉为“推倒了博物馆的高墙”，进一步实现了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还有博物馆推出了手机导览项目，一些博物馆的手机互动应用程序也在进一步设计开发中……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与博物馆（纪念馆）的关系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博物馆人纷纷意识到，新媒体的发展势必影响到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如果说，对传统媒体来说，在新媒体时代，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新媒体，那么，对博物馆人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应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体。

不过，笔者发现，虽然近年来关于博物馆与新媒体的探讨并不少，但是，学者们大都关注于如何将新媒体的技术手段应用在陈列展示中，或者是新媒体

与数字化博物馆的关系，却鲜有学者讨论如何将新媒体与博物馆（纪念馆）的宣教工作结合起来。事实上，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模式和媒体形式，它对传统媒体的最大颠覆在于从原先“一个人（或一群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变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样的转变，也深深影响到博物馆（纪念馆）的宣教模式。笔者认为，讨论新媒体与博物馆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新媒体对博物馆（纪念馆）宣传教育活动的影响。

新媒体对宣教工作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宣教工作其实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宣教工作的常见方式：讲解、宣讲、表演、主题活动等，都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传统宣教工作的模式，从策划到实施，基本是主题先行——先设定传播的内容（而非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也很少去考虑受众的特点。虽然近年来，博物馆、纪念馆的宣教工作者纷纷提出创新宣教模式，以巡讲、巡展、巡演、巡播和各类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我们的宣教活动，但在新媒体所带来的全新传播模式的冲击之下，我们的宣教活动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宣教活动还是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潮流。

以电影《青春雷锋》为例，2013年3月5日，在“学雷锋纪念日”50周年之际，讲述雷锋从小学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在宁上

映。遗憾的是，这部《青春雷锋》在南京上映首日竟然出现了几乎“零票房”的尴尬局面。《青春雷锋》遭遇“零票房”一时间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其实，这部电影的票房失败与新媒体的冲击有着很大关系，在新媒体时代，走进影院看电影的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转变为主动的信息选择者。虽然《青春雷锋》上映前组织过几场试映，还有一些媒体对这部电影“大加赞誉”，在宣传中还刻意强调片中涉及了雷锋的爱情生活，电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雷锋”。但是，如今的观众并不会因为一些媒体的吹嘘之言就买票进场，他们更具有自主性，对他们来说，主流媒体的宣传并不可靠，网友的“点评”才更加可信，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习惯和网友的推荐来选择自己观看的电影。新媒体对这部电影的冲击还在于，就在3月5日前后，对雷锋故事真实性的质疑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有人发问：“为什么雷锋每次做好事，都正好有相机拍下？为什么雷锋捐出的款项超过了他本人的收入？”在这样的质疑声中，宣教工作者不仅没有抓住人们的关注点去正面回应，还不合时宜地推出这样一部“讲述雷锋爱情生活”的电影，电影票房的失败几乎成为必然。而对新媒体的受众来说，《青春雷锋》遭遇票房滑铁卢又反证了网友们对雷锋故事真实性的怀疑，这样的传播，只能作为宣教工作者的反面教材。

其实,《青春雷锋》并非特例,在纪念馆的宣教工作中,新媒体的影响比比皆是。例如,在各大纪念馆,在讲解过程中,亦步亦趋跟着讲解员听讲的,往往是中年、老年观众,而青年人宁可自己打开手机网页,去搜索他想知道的信息。再比如,参观结束后,参观留言本不再是观众自我表达的唯一途径,人们会在微博、微信上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心得,而他所分享的内容,又会成为那些打算来馆参观的观众们的“参观指引”——在大多数时候,这样的“参观指引”和官方的参观指南往往相去甚远。

笔者认为,新媒体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将会(或者已经)影响我们传统的宣教模式。

1、互动性

传统的媒体都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体地位,受众无法对讯息进行筛选,他的接受是一种完全被动的状态:只能选择听或者不听,而不能选择听什么。同时,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也没有信息的“反馈”,更缺少交流。教师在课堂授课就是典型的单向度传播,讲解员的讲解也是如此。而在新媒体时代,“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被认为是新媒体的最大特征,传播者与受众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对每一个用户而言,在他阅读微博时,他是受众,但是,当他发表和转发微博时,他又成了传播者。新媒体鼓励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

对宣教工作者来说,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不仅要去做说教者,还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及时关注观众的言论,及时与之互动交流。

2、快捷性

科技的进步使得信息传播越来越方便快捷,进入新媒体时代后,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用户的终端设备无不具有海量的信息储存能力、高效快捷的信息提取功能和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人们也就可以越来越方便地通过网络获取所需的信息。笔者认为,这种转变事实上给纪念馆的宣教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例如,当观众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轻而易举地获得关于纪念馆和展品的信息时,人们是否还会愿意去听讲解员的介绍,尤其我们的讲解模式多数时候是“一”对“多”,明显无法满足观众的个性化的需求。再如,新媒体技术通过与数字媒体技术相结合,可以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影像等多种信息复合为一体,通过互联网实现多媒体和超文本的传输,将平面传播变为立体传播。这样的传播方式相对于我们的讲解明显更加生动、深入、形象,那么,此时讲解员的作用又如何发挥呢?

3、多元性

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信息发布者身份的不确定和目的的千变万化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信息包罗万象,同时价值取向多元化,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呈现出自

我性、随意性、多样性、零碎性等特征。以微博为例，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简短性，140字的文本，或是一段视频，或数张图片，就构成了一篇微博。由于信息量有限，在简短的篇幅中，信息发布者常常只能表达自己当时的一段思绪、一个想法、一种见解，这就让微博的片段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更为明显。作为宣教工作者来说，就常常需要直面这种多元化的价值观和更为多样的解读方式。例如，纪念馆陈列了革命领袖的一件衣服，作为宣教工作者，往往是从领袖生活简朴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权威的、唯一的解读不复存在，每个人会从自身角度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些人会从服装发展史的角度去看这件文物，有些人则会纯粹从审美的角度去解读，而有些人则热衷于从衣服的细节之处去推断领袖的生活习惯。

宣教工作中新媒体的应用

新媒体时代对纪念馆的宣教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应对这种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勇敢地尝试运用新媒体，在探索中积累经验，不断改进、创新纪念馆的宣教工作，与时代接轨。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国内的纪念馆纷纷开始尝试运用新媒体，或是开通官方微博、微信，或是在新媒体平台开展各类全新形式的宣教活动，或是线上线下互动，将传统宣教活动与新媒体的传播结合起来，取得了不俗的成效。目前，纪念馆

宣教工作中对新媒体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微博平台

目前国内纪念馆开通官方微博的并不少，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都积累了相当的人气，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本馆宣教工作的开展。在各大纪念馆的官方微博中，运作最为成功的非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微博莫属，该微博目前“粉丝”数已达258万，网友跟帖评论17万多条，转帖27万多次，跻身新浪网站“政务微博风云榜”，为传播雷锋精神、弘扬新风正气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是一个为中国梦、强军梦聚集正能量的有力阵地。

2、微信平台

目前开通微信公共账号的纪念馆并不多，只有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梅园新村纪念馆等少数纪念馆开通了微信公共账号。与微博相比，微信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的受众并非微信全体用户，而是特定的关注者，因此，微信的受众数量可能较微博更少，但在进行信息推送时更为主动，信息到达率更高。其次，微信没有字数的限制，传播信息更为方便，可以通过排版工具，一次发布多个信息，也适合用来发表“长篇大论”。最后，微信平台具有语音传输功能，可以与馆内的参观导览相结合，结合软件开发和后台支持，可以实现更为多样的功能。

3、APP（手机应用程序）

相比于微博和微信，目前国内纪念馆为本馆开发专门的APP(手机应用程序)的极少，只有少数博物馆，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中山舰博物馆开发了专门的手机应用程序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其实在国外，手机应用程序在博物馆的应用已十分普遍，早在2011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为配合该馆“千秋帝业：兵马俑与秦文化”展，就曾特别推出了世界首个专为博物馆而设计的苹果手机综合导览程序。该程序的最大亮点是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开发了多种多样故事性极强的互动节目。在参观中，观众不仅可用手机观看兵马俑拉弓、射箭等虚拟场景，亲身体验秦国将士的昔日风采，还可与兵马俑合影，玩各种秦文化浓重的迷你游戏，或以3D动画形式欣赏自己感兴趣的展品等。

不过，新媒体的运用也必然伴随着一些新问题的出现，从硬件角度来说，并非所有手机都能成为新媒体的移动终端，手机系统与各种应用程序之间常常存在兼容性的问题，纪念馆花大代价定制的客户终端也会因网速、屏幕分辨率的制约而效果大打折扣，在移动互联网信号覆盖不佳的场馆，新媒体的运用更会受到诸多限制。从受众角度来说，新媒体毕竟只是在特定的人群中得到广泛应

用，在传播中势必还要考虑分众化的问题，同时，新媒体平台上鱼龙混杂，常常呈现无序化和非理性，既存在大量的谣言，也充斥着不少假、丑、恶的东西，甚至还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恶意煽动，对于新媒体“负能量”的危害性，纪念馆人必须要提高警惕。从纪念馆自身来说，纪念馆工作人员对新媒体规律的掌握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在探索开发利用新媒体的过程中，必然会走一些弯路，作为纪念馆的管理者，也应要做好准备，应对各种新情况，例如，在使用手机导览互动和二维码扫描时，必然要在展厅内用到手机的拍照功能，此时，国内纪念馆禁止拍照的传统又如何与之相适应？最后，新媒体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技术的变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应用在新媒体的传播中，各种终端、平台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让人目不暇接。这就要求纪念馆的宣教工作者紧跟时代的步伐，但是，又不能在新媒体的海量信息和多元价值中迷失自我，所以，在新媒体时代，不只是纪念馆，纪念馆的宣教工作者也面对着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应对这种压力和挑战，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接触新事物、驾驭新技术，更要坚持纪念馆人的原则和使命：以史明志，以史立德，以史育人。

参观南京博物院有感

撰文 / 花婆婆

2013年11月，南京博物院改扩建完成，重新对外开放。为了拓宽我们的视野，馆里组织大家去南京考察学习，笔者有幸参观了大部分展馆，一些先进的设计理念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更多思路。

一、层次分明的序厅

在参观的大部分展厅里，馆方都尽可能的让序厅更有层次感，有几个展厅的表现手法都让我印象深刻。在最先参观的《傅抱石艺术展》中，其中“傅抱石”和表现其艺术特点的山水画都做了“凸起”的设计，既强调了展览主题，也给人留下了最初的参观印象。《江苏古代文明》展的序厅中，中文前言旁是一个内凹的窗棂设计，英文前言旁边是一个外凸的繁花图案。一边为白色，一边为红色，很有视觉冲击力，给人以江苏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初印象。在《金色中国》序厅里，在数道黑色的立轴的前方放置一方精美的文物。有一种肃穆庄

严、大气恢宏的感觉，让观众不自觉地沉浸在设计者所为你营造的氛围里。《历代绘画陈列》馆中的序厅层次更为丰富。首先是视角正前方点明陈列内容历代中国绘画，右侧墙壁上印有展览主题名《丹青·盛事——江苏历代绘画流派特展》，进一步阐明特色，左侧是展览前言，左侧和正前方还分别挂有文物，一个作为开头，另一个作为展览结尾。这样的设计考量很有用心，不过有时会迷惑观众，像我们就是从展览的最后部分进入参观的。所幸展览是按流派分类设计，从头看和从尾看并不会会有太大影响。



▲ 《江苏历代绘画流派特展》序厅

二、单元说明文字

展览中，单元说明文字必不可少，它们能够尽快帮助观众理解展览的主要内容，引导观众更进一步理解展览主题，其形式设计南博可谓非常用心。在绘画展和书法展的序言里，中文前言全部使用竖排文字，依照古代书写模式，更加贴进文物的特质。在《金枝玉叶》展厅中，每一个单元的文字说明牌都存在共性，也有个性特征，如耳饰类文物的文字说明牌中就有耳饰的图案，手镯类文物的文字说明牌中则换成了有特色的手镯，非常注重个性化。在《走进佛前》展厅里，说明文字集中在一个佛龕中，把文字排列成器物的形象，这一设计符合展



▲ 个性的单元说明文字

品特点，观众会不自觉地受其影响。《盛世华彩》集中展示了南博收藏的瓷器，其中前言文字设计嵌套在一青花瓷瓶图案中。单元说明文字嵌套在不同的瓷器图案中，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设计。

三、文物说明牌

在南博大部分的展厅中，它的文物说明牌都集中体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倾斜。这种陈列角度更加贴近人体科学，让人不用俯身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说明牌上的信息，可谓体贴之至。在不同的展厅中，使用的说明牌不完全一致。在《傅抱石艺术展》和《历代中国绘画》展厅里，主要文物是以立轴形式展现，说明牌其实完全可以贴在墙壁上，也不影响观看效果，但是设计者巧妙地做了一个倾斜角度的说明牌，固定在墙上，让小小的牌子一下子变得雅致起来。由于存在的这一角度，说明牌也离观众更近了一些，更加便于观看。另外通柜里常用的说明牌是用支架支撑起一个斜度。在历代雕塑展中，说明牌是最为常见的有机玻璃，它也是特意制作了一个小托架支撑起斜度，但是底下的托架多少有些影响说明牌上的文字，其实可以采用更为简单的将有机玻璃弯折的方式实现倾斜。在江苏历史文明展厅里，说明牌较为简单，却仍然注重了倾斜。设计者将说明牌倾斜放置在托架与展柜上，并用大头针固定。虽然简单，但不影响效果。在《陈设清宫》等展厅中，倾斜的方式笔者认



▲ 倾斜的说明牌设计

为做得是最自然和舒服的，设计者在托架的制作中就考虑了文物说明牌的倾斜嵌入，让说明牌与托架成为一体，与文物更协调。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还有一部分文物说明牌完全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它们被放置在通柜两侧的下方，完全脱离了正常观众的视线范围。这种方式通常出现在文物较多的展柜中，笔者推测设计者是出于美观和不影响参观的考虑这样放置的，初衷应该是不让观众受到文字打扰，用心欣赏文物。但是对于不太懂行的普通观众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诉求还是要弄清楚我看的是什么东西。这时如果要搞清楚它叫什么确实要付出一定

的体力劳动了，你需要不停地走到说明牌处，然后蹲下来看这是什么，让人既郁闷又扫兴。

四、精彩纷呈的托架

托架是帮助文物展示自己的重要方式，有些文物可以直接放在展台上展出，有些文物则需要通过托架固定和烘托。为了保护文物，南博为部分长的书画和丝织物底部都使用了托架托起。为了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书画上部过长的部分也用透明的夹子夹起。在南博，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托架，它们根据文物形状，总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展示在你的面前。南博最常见的托架是一种白色中空的立方体，通透又富有现代气息。有些文物则需要不同大小的托架组合支撑，像一些佛教立像，有一定弧度，就在后面支撑了一个更高的托架，防止跌落。还有一种佛教头像，只放在托架上不稳定，便在后面支撑了一个小的立方体，既美观也不影响文物整体形象。笔者看到一个小屏风，本来可以直接放置在一个大的托架上，设计者却选择使用了两个小的立方体托架支撑，很有特点。一些小的塑像，如果内有中空的，就在托架上支撑起一根细的圆柱体固定文物，对于实心的塑像，则后立一根细的圆柱体支撑文物。另外托架还可以只展示你想要观众看到的部分，《江苏古代文明》的明清部分在展示大报恩寺塔琉璃构件时，将一个很大的建筑构件放在立方体



▲ 多样化的托架

托架内展示，只露出了有花纹的部分，设计巧妙，让人佩服。托架通过不同的组合，上面摆放不同的文物，形成了多种层次，让文物错落有致，非常好看。托架也可以多层次运用，固定在墙上的托架如果做成立方体，不仅上面可以摆放文物，前方也可以悬挂文物。另外还有根据文物形状设计的三角状托架，用以托起薄的有图案的文物，如木板，窗框等。这样的托架，可以倾斜展示文物，而且后面的支撑既清楚又不妨碍文物。

五、文物摆放方式

文物的摆放方式多种多样，在博物馆中，大部分都是中规中矩的端正的器物摆放，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南博中笔者看到了许多变化。在《江苏历

史文明》展厅中，有几个动物塑像，它们都是被侧着摆放的，这种方式更加明显地体现出动物的生动性，显得更可爱、更萌。不同朝代的陶瓷器都设有标本陈列室，各种器形集中摆放，可以看到明显的发展进程，会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同类文物也没有选择一种摆放方式，如画像砖，最常想到的是将砖石平放展览，而设计者除此之外，还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让它们横竖错落摆放。能够组合成大幅图案的画像砖，一种可以嵌在墙壁中，一种通过托架放在展柜里，个人认为第一种更好。南博最吸引我的是一种“混乱”的摆放方式，在《江苏历史文明》展厅中，其中一个展柜的硬陶甬钟有立着的，有侧躺的，有仰躺的，是一种看似混乱，实则有心地摆放。笔者推测设计者可能在模仿这些文物的出土状况，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观察钟的内部特征。

在大部分的展厅里，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展台，陈列着让人赏心悦目的文物，这种摆放，有时无序可巡，却也觉得颇为顺眼，有时遵循某种规律，让人觉得视觉舒适。在《走进佛前》展厅，大部分的佛像使用佛龕的造型辅助展出，还有一种笔者觉得很好的形式是一种规律图形的组合搭配，有一组佛龕就是两边用倒三角，中间用正三角的形制展出，整体感觉很协调，又不会过于死板。展厅中间立柜里的佛像展示也很注意细节，因为无法用佛龕展示，便在佛像身后竖



▲ 别具匠心的文物摆放方式

立了一个有机玻璃形制的佛龕，在展台的侧面还刻印了莲花图案，借以营造庄严神圣之感。

六、背景颜色的选择

在南博，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它们已经脱离了厚重的范畴，附上了典雅、现代的标签。白色是南博随处可见的颜色，这种颜色干净、明亮，用来展现文物最好不过了。笔者注意到《历代雕塑陈列》的吊顶使用了大面积的白色，在博物馆中非常少见，这种设计方式非常抢眼、好看。在《江苏历史文明》的史前文明展厅，有一个旧石器时代展柜，背景墙模拟的是泥土岩石的颜色，衬布也用的是黄褐色系，给人浓重的古朴沧桑、岁月流转的感觉。在展示不同样式的金器时，设计者使用了三种主色调。在《金色中国》展示各地精美金器的展厅，使用了黑色，表现出一种稳重高贵的风格。《金枝玉叶》展厅使用了紫红色，作为展示首饰类文物的底色，烘托出一种富贵气质，折射出使用人的性别特征。



▲ 佛教金器选用红色作背景色，崇高圣洁



▲ 《陈设清宫》展厅中灰蓝色与白色混搭

《走进佛前》展厅使用了正红色，与黄色的鎏金佛像对比，呈现出美轮美奂、崇高圣洁的氛围。

混搭在展台的布置上和背景的运用上非常明显，最为常见的运用就是白色与各种颜色的混搭。在《金色中国》展厅，可在展台上随处可见黑色与白色的搭配。黑色作为主背景，中间截取一方白色的背景用于展示文物，灰色的说明牌置于下方白色背景之上，大方简洁。在《陈设清宫》展厅中，选择的是灰蓝色与白色的混搭。在《盛世华彩》中，你可以见到蓝色与白色、黄色的搭配。《精准与华美》展厅里浅灰紫色与黄色、灰蓝色、黑色等颜色的交织，确也不显杂乱，

主要原因是它们都采用了灰色这一没有侵略性的颜色，并且并没有大面积运用，大部分颜色只是作为装饰线存在，黑色也只是作为边框的界限，没有突兀地介入到文物中。

七、几何图形的运用

除了根据文物形制特征抽象出来的图案外，南博还非常喜爱运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装饰线。单一几何图形的运用在《盛世华彩》展厅中非常明显，里面大量运用了金色的长方形作为装饰线。有些长方形是单独运用的，放置在背景顶端作为装饰，里面的背景印有瓷器纹路，雅致好看，有些长方形是作为文物的展示背景，让托架上的文物自成一體，形成分割，既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几何图形不是孤立的，有时它们还会组合运用，辅助一件展品的陈列。在《精准与华美》展厅中，为了展示一件钟表，在支撑它的托架上下两方都置有一个长方形灰色装饰条。另外一组在一个长方形的装饰条内，用黄色的托架展示两件文物，在装饰条内的上下方，也会布置有不同宽度的黄色装饰线。嵌套是这种长方形组合的另一种方式，不是简单的大长方形套小长方形，而是将正方形半嵌套在长方形内，正方形内文物上方设有黄色的装饰条，这种多变的方式增加了可看性，也无损展示文物的特性，这种变通值得我们借鉴。

此次南京之行，收获良多，除了欣



▲ 几何图形的运用

赏到大量精美的文物，还见识了诸多别具匠心的设计，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更多启发。虽然优点数不胜数，但是南博仍有一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有些展柜反光得非常厉害，部分展厅还有一些空的地方，应该放文物而没有东西，如果实在没有文物摆放，那么放置一些绿色植物也会好些。隔离栏实在太多太突出，非常影响参观心情。另外展览文物实在是海量的呈现，给人一种琳琅满目却又无从看起的感觉，到最后只能走马观花，草草收尾。即使如此，南博在博物馆陈列上的诸多创新仍是我们应该尊敬的，只有不断进行变革，博物馆才能焕发持久的生命力，成为大众选择的心灵休憩场所。

宋庆龄卧室里的一块镇绷石

撰文 / 宫洁菁

上海淮海中路 1843 号是宋庆龄曾经长期居住的地方，是她在上海的家。1981 年宋庆龄去世，她淮海中路的寓所被作为永久性纪念地保存了下来。随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成立，这幢寓所以及寓所内的遗物便成为了纪念馆的馆藏文物。

纪念馆馆藏文物种类繁多，有文稿、书信、照片、印章等反应孙中山、宋庆龄革命轨迹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还有一些本身即具有一定价值的艺术品和大量的生活用品。宋庆龄的生活用品很普通，与一般家庭所使用的并无二致。但由于存放得当，很多民国时期，乃至清代的物品都仍保持着较好的面貌。这些物品在那个年代或许并不鲜见，但安然保存到了今天，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

故居主楼宋庆龄的卧室里就放置着这样一件非同一般的物品，长期以来，它都“安静地”躺在卧室门前，“默默地”



▲ 上海宋庆龄故居保存的镇绷石

发挥着它的作用。故居每天迎来送往，人流不息，但几乎没有游客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相对于卧室里的其他摆件，它着实不起眼，它只是一块被放置在房门前，用来抵门的石头。之所以把它当作“抵门石”，自然是沿袭宋庆龄本人生前对房间物品的摆放方式。而事实上，这块看似其貌不扬的石头却是大有来头，故居的老领导刘世襄首先发现了它的“真实身份”，并嘱咐笔者撰文为其“正名”。这块石头其实是有着极高艺术价值，现在在上海几乎已经绝迹的女红工具：镇绷石。

镇绷石，即用于镇、压绣花绷架的工具，因材质为石，故名。古代女子皆擅女红，她们在绷架上绣花，为使绣面挺括、平整、匀称、不起皱，就在绷架的四角用重物镇平或吊平。最初的镇绷之物，仅是一些有重量的东西，后来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逐渐艺术化起来，镇绷石就是这种艺术化的结晶。随着艺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镇绷石也慢慢从普通的生活用品演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艺术品。

据考证，明代已有镇绷石，清代、民国最为普遍，原产地为浙东的宁波、绍兴地区，后宁波籍人士移居上海，也就在上海流行起来了。明清时代的石雕艺术不乏珍品，但多为大型遗存，如石狮、影壁、牌楼等，像镇绷石这样的小件艺术品是很鲜见的。^[1]

镇绷石是地道的石雕艺术，所用材质大多为青石，也有灰石与紫石。此类石质比较细腻、紧密，适宜于细雕，且时间一长能产生光滑铮亮的包浆^[2]。镇绷石通常为秋叶状，秋叶上雕刻着千姿百态的美女，或读书，或小憩，抑或怀抱婴儿……均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场景，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宋庆龄卧室里的这块石头可以说是镇绷石的典型代表。石头为秋叶形，叶形轮廓十分优美，叶面底部有一圆孔，用来系扎绳索，与绷架相连；叶面上方雕刻着一个头梳发髻，身着对襟衣衫的妇人，她面颊丰腴，慈眉善目，身倚圆枕，环抱一小童，雕刻形态颇为生动自然，

又极富女性柔美之感。这块镇绷石的特别之处在于，石头外面还上了一层彩色的釉。因为是实用物品，而且年代久远，釉色稍有斑驳，但仍可看出，这位妇人的衣衫颜色鲜亮、纹饰繁复，且头戴首饰，发髻华美，显然这里所雕刻的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夫人和孩子。

得益于宋庆龄的妥善收藏和几十年来纪念馆工作人员对室内环境的恰当保护，这块镇绷石除釉色有些剥落之外，整体外形完好如初，对于一类濒临绝迹的艺术品而言，这着实难得，其价值亦不言而喻。

那么，这样一块镇绷石出现在宋庆龄的卧室里，它和宋庆龄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若作镇绷之用，那应该有四块这样的石头才符合常理，这里却仅有一块，而且也没有绷架、绣线等其他绣花的必备工具。宋庆龄到底是否使用过这块镇绷石呢？

宋庆龄出生在清朝末年，在父母的安排下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语、拉丁语、钢琴等等，9岁即进入用英文教学的中西女塾读书，14岁远赴美国求学，大学毕业嫁给孙中山之后，就开始投身于民主革命。基于宋庆龄的受教育状况和成长经历，笔者推测她对于中国传统的女红是不擅长的，即使在幼年时有所接触，之后长期的海外求学生涯以及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活也不可能让她有机会重拾女红活计。

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书

中写道：

那个时代，有出息的中国姑娘都懂得如何在丝绸上刺绣……葛龄对静坐半天才绣出一条边的光景感到沉闷无聊……她的小妹妹们自然也都跟她学……宋耀如对小女儿们厌恨女红活计寄予同情……她提醒妻子，既然花几美元就能买到最好的刺绣，那么用这种精工细活去损害孩子们的眼睛就完全没有必要……宋夫人对此可能信服了……孔夫人自己毫不后悔地作证，她甚至在今天也缝不直三针线。

由此可见，这块镇绷石的使用者应该不是宋庆龄，自然也不是她的姐妹宋蔼龄或宋美龄。那它又怎么会出现在宋庆龄的卧室里？有没有可能是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使用过的？

倪珪贞 1869 年出生川沙一基督教传教士家庭，父亲倪蕴山是上海伦敦会天安堂牧师，母亲徐氏是明代礼部尚书、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倪珪贞自幼读书家塾，四、五岁入学校，十五岁升西门裨文女学，她精算学，擅钢琴，还会英文。^[3] 基督教家庭背景让倪珪贞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妇女，她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包括一些西式教育；但相比于宋庆龄那一代，倪珪贞显然传统得多，她没有留学经历，所受的教育大部分都是中式的，她像一般中国妇女一样，婚前待字闺中，婚后相夫教子。而女红在当时来说，几乎是女性必备的手艺，对于有钱人家的小姐、妇人而言，绣花可能就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因此，倪珪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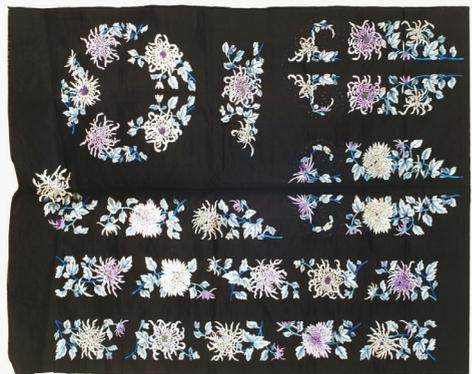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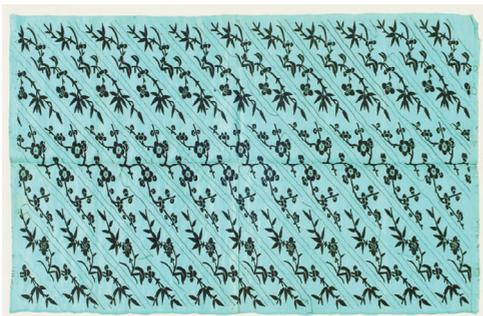
▲ 倪珪贞

会绣花这个假设是能够成立的。

据倪珪贞胞兄倪锡令的女儿倪爱珍 1984 年的回忆，“……老二倪珪金是大娘娘，很凶，几个妹妹都听她的话，绣花绣得很好，教中学。老三倪珪贞，很聪明，有钱，买缝纫机，小孩衣服都自己做……”^[4]

又据宋庆龄原警卫秘书隋学芳的女儿隋永清所述，宋庆龄生前曾赠送给她多幅绣品，都是宋庆龄的母亲当年留下来的。这些绣品多是丝绸质地，绣的图案各不相同，有花草、鱼虫、鸟兽等等，其中有些是可直接用作摆设的绣片，有些则可用于来做衣服的花边，每件绣品都极为精美。

笔者认为，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倪家姐妹包括倪珪贞，应该都是自幼就学习女红的。暂且不论倪珪贞对此是否喜欢或者在行，从她保存那么多绣品以及要求女儿们学习刺绣来看，



▲ 倪珪贞留给宋庆龄的绣品

她对于这门技艺是熟悉并且推崇的，不能排除她在闲暇时小试身手的可能性。

综上基本可以推断，宋庆龄卧室里的这块镇绷石很可能是她母亲倪珪贞所使用过的，而且是她与宋耀如结婚生子后在自家使用的。

那么，倪珪贞使用过的镇绷石又如何到了宋庆龄的寓所？

倪珪贞于 1887 年婚配宋耀如，婚后即随丈夫赴昆山、七宝、太仓巡回传教，之后生育子女六人，主持家政，教育子女。1918 年宋耀如去世，倪珪贞携子女迁居至上海西摩路 139 号（今陕西北路 369 号）寓所，前后居住了 10 余年。1931 年倪珪贞去世，西摩路 139 号即由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料理使用。

为便于保管，宋庆龄陆续将西摩路 139 号内的一些家具、物品搬至自己的寓所。或许宋庆龄幼时在家曾看到母亲使用这块镇绷石，又或许她觉得这块石头造型别致，所以就把它一起搬回了自己的寓所。因为是娘家带来的物品，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宋庆龄很珍视，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里。

当然，镇绷石在新的时代，在宋庆龄这里是彻底失去用武之地了，最终由于石质沉重，被用来抵门，也算是发挥了它最后的实用价值。可能宋庆龄本人没有想到，这件原本十分普通，几乎每家都有的生活用品，若干年后竟由于它的艺术性和稀缺性，成为了一件极具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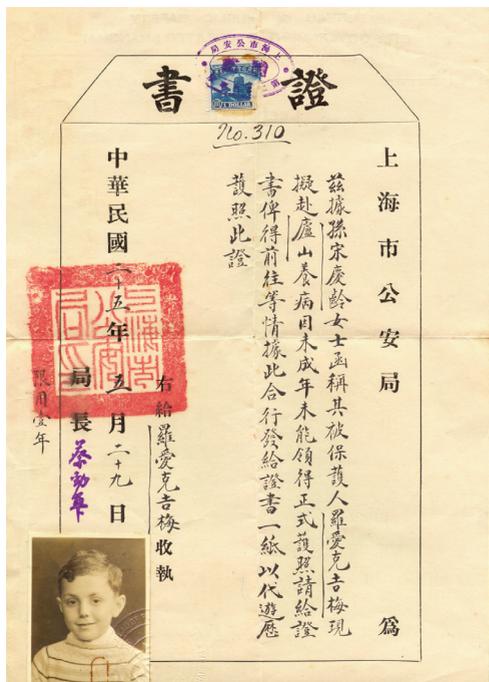
[1] [2] 杨韶荣：《镇绷石雕刻艺术》，《上海工艺美术》2004 年第 2 期。

[3] 《宋母倪太夫人讣告》，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4] 《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版，第 157 页。

宋庆龄保存的一张“证书”

撰文 / 麦灵芝



▲ 罗爱克吉梅的身份证书

宋庆龄保存着一张上海市公安局1936年5月29日出具的身份证书，这张证书是宋庆龄为一个名叫罗爱克吉梅的外国孩子办理的。宋庆龄称这个孩子是她的被保护人，准备去庐山养病，因尚未成年没有正式护照，故申请办理身份证明以代游历护照，证书的左下角有一

张吉梅的半身照片。

那么这个名叫罗爱克吉梅的孩子究竟是谁？宋庆龄为什么会成为他的保护人，并为她申请办理身份证明？要搞清楚这些，还得从1913年那个轰动国内外的“牛兰案”说起。

牛兰夫妇被捕

1931年6月15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持有瑞士和比利时护照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及其妻子和孩子。警察在他们的住处查获数百份共产国际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文件，以及存有数万美元的多张银行存折和一些账册。

其实牛兰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原名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格，牛兰是他在中国的化名。1929年2月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它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其工作范围包括联系和指导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开展活动。远东局



▲ 牛兰夫妇

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牛兰在联络部工作，负责接收并转送共产国际与远东地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信件、报告；安排人员往来交通；通过合法的商业途径接受共产国际转入的资金，并定期向亚洲各国共产党提供活动经费。牛兰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实际是国际红色工会在远东的一个分支机构。牛兰以商业公司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1930年牛兰的夫人汪德利曾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牛兰的工作。

牛兰被捕是由于一个偶然事件引起的。1931年6月1日新加坡一名法国共产党人因在马来西亚从事秘密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从他随身携带的共产国际文件中发现了一个在上海的信箱号，很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一情报，迅速查明了信箱的主人。这个节外生枝的事件导致牛兰一家被捕。由于牛兰夫妇被捕后始终坚称只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上海租界巡捕房费尽周折还是没有查清牛兰夫妇的真实来历和底细。不巧的是，4月24日

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他供出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些情况，之后被顾顺章供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也提到有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1]。于是国民党情报机关马上把这些供述和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的牛夫妇联系起来，怀疑他们是共产国际在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或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

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正式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8月10日，租界警方将牛兰一家移交国民党上海市政府。8月14日，牛兰一家从上海押送到南京，关进了江苏省第一监狱。

国际营救

牛兰夫妇被捕给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造成重大损失，不仅切断了共产国际与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而且直接威胁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安全。从牛兰住处搜出的文件中，暴露了已被捕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员阮爱国的身份，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下属南方局的负责人胡志明。一些与共产国际有联系的日共党员也开始被日本警方追捕。一时间，牛兰案成为当时轰动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受到社会媒体的大量关注，牛兰夫妇

被押送南京的当天《申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写到：“上海捕获之牛兰，已解京讯办。此案内容，未经宣布，故不知其详。然闻牛兰为第三国际之特派员，其在沪之机关，为赤化东亚之总机关。此说果确，诚近年稀有之国际大案件矣！”^[2]

为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开始组织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一方面发动国际进步组织、劳工组织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士发出抗议和营救的电报，对中国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释放牛兰夫妇。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起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先后向数十个国家的会员组织散发十几种文字的救援公告和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由于牛兰还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出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也发起“保卫无辜的工会秘书”运动。1931年8月20日，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亨利·巴比塞以及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在欧洲发起成立了牛兰夫妇的国际援救委员会。一时间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国际性的运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又指示苏军总参谋部在华的情报人员佐尔格小组采取更直接的营救行动。佐尔格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央特科”密切配合，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打通关节，了解牛兰在狱中的情况，并积极设法保全牛兰的性命。

宋庆龄的营救工作

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捕时宋庆龄还在德国。7月31日宋庆龄因母亲去世回国奔丧，到达上海后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就接到了以西奥多·德莱塞、蔡特金、罗曼·罗兰等数十位文化、艺术、科学界的国际知名人士发来的电报，他们纷纷恳请宋庆龄出面援助牛兰夫妇，免除不良待遇，并求得释放。共产国际也通过驻上海的情报小组与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营救牛兰夫妇。众望所归的宋庆龄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营救牛兰的行列当中。她设法联系牛兰夫妇的外籍律师，协商为牛兰夫妇进行法庭辩护及营救之法，派美籍进步人士马海德，以医生名义去南京监狱为牛兰夫妇治病。12月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提出，让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回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请宋庆龄与蒋介石谈判。为此，宋庆龄亲自来南京，与蒋介石面谈，转告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建议。此次谈判蒋介石日记这样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3]显然，宋庆龄转达的建议遭到了拒绝。

牛兰夫妇自引渡到南京入狱后，国民党政府一直拖延不开庭审理，对外界的呼吁声也不作公开回应。狱中的牛兰夫妇多次以绝食抗议。1932年4月26日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联名向牛兰

案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国民党政府予牛兰夫妇以公开之审判，并许其自聘律师辩护，如证据不足，并望立予释放。迫于各种压力，1932年5月，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以危害民国罪审理了牛兰夫妇案件。在法庭上，牛兰夫妇据理力争，并以绝食抗议。

为了进一步壮大营救活动的声势，庭审期间宋庆龄在上海组织了“牛兰营救委员会”。委员会在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称：“我侪与欧美各国之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关心牛兰夫妇案者，共同联络，为人类正义有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4]宋庆龄还多次从上海到达南京，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告他们停止绝食，并亲自找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交涉，提出与蔡元培二人具保，将牛兰夫妇移上海就医，在遭到罗文干拒绝后，宋庆龄仍然不放弃，最终国民党司法当局同意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三人具保让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即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牛兰案宣判后，国际营救行动暂告一段落。但宋庆龄对牛兰夫妇的援救工作并未就此停止，她继续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敦促国民党当

局特赦牛兰夫妇。1933年4月5日，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并到江苏第一监狱看望牛兰夫妇，询问监中的生活情况。1933年12月牛兰夫妇在狱中再次绝食抗争，宋庆龄得知后，连续给汪精卫、立法院院长居正和罗文干致电，一再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保护吉梅

在这场公开的营救运动中，宋庆龄是当之无愧的先锋。她不遗余力奔走呼吁，使狱中的牛兰夫妇最直接地感受到外界对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们对宋庆龄非常信任。牛兰夫妇有个儿子名叫罗爱克吉梅，1931年夫妇俩被捕时他才4岁。牛兰夫妇入狱以后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儿子，虽然有人表示愿意抚养，但是牛兰夫妇只信任宋庆龄。因此，当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代表、《中国论坛》的记者伊罗生到南京监狱探望牛兰夫妇时，牛兰夫人托他代为起草遗嘱，并希望将其6岁的儿子吉梅托给宋庆龄抚养。于是宋庆龄便担当起了吉梅的保护人，并出面将吉梅送到他们都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寄养。宋庆龄托马海德医生经常去关心孩子的生活，并让马海德到狱中探望牛兰夫妇时，把吉梅的生活情况告诉他们。1936年，赫尔兹夫妇要回德国了，在回国前他们来到监狱，征求牛兰夫妇的意见，是否同意将9岁的吉梅带到德



▲ 宋庆龄与吉梅在莫利哀路寓所



▲ 吉梅在莫利哀路寓所玩耍



▲ 吉梅在“北方号”轮船甲板上

国。当时，牛兰夫妇很焦急地说：孩子不能去德国，应去找宋庆龄想办法。最后，宋庆龄把吉梅接到自己家中，亲自照料他的生活。据吉梅后来的回忆称，在宋庆龄家住了几个月，宋庆龄还让他戴上中式帽子，穿上中式长衫照相，并将相片送给狱中的父母看。如今在宋庆龄保存的照片中，已找不到吉梅穿中式服装的照片，但还是发现了几张当年他在宋庆龄家中的留影，其中有吉梅独自一人的，也有和宋庆龄在一起的合影。照片都是很随意的生活照，从吉梅灿烂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在宋庆龄的照顾下，他生活得非常好。然而这段时间宋庆龄的身体却一直不佳，也许是过度疲劳，从1936年4月起宋庆龄就因健康原因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休养了一阵。5月宋庆龄又因盲肠炎住进医院治疗，直到6月初，手术伤口还没恢复。在6月5日宋庆龄给鲁迅的信中曾提到：“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6]。从这张吉梅的证书可以看出，宋庆龄5月仍有打算带上吉梅一起去庐山疗养的想法。为此她亲自致函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为她 的被保护人罗爱克吉梅去庐山疗养等事准备旅行用的身份证明。从庐山休养后宋庆龄在回上海之前，又专程去南京看望了仍然在狱中的牛兰夫妇。这年底，宋庆龄通过苏联驻华大使波格莫诺夫，把吉梅送到苏联。宋庆龄将吉梅送上了去海参崴的“北方号”轮船，并特地在

轮船甲板上给吉梅留了影。或许是准备把照片带给狱中的牛兰夫妇，好让他们看到，吉梅已安全回国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牛兰夫妇重获自由。他们来到上海，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是宋庆龄给予他们许多资助和关照才使他们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他们才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最终得以返回苏联。

六十多年后，当吉梅回忆起年幼时的那段经历，依然对当年宋庆龄对他一家无私的帮助充满感激。他希望有生之年能重返中国，到上海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到宋庆龄的墓前献上一朵小花，说声谢谢。他说这也是他父母的遗愿。



[1] 杨奎松：《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9期，转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卷，第160页。

[2] 《申报》，1931年8月14日。

[3]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4] 《申报》，1932年7月12日。

[5]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140页。

[6]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9页。

霍赫洛玛彩绘盖罐

撰文 / 高海涛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过道厅的书架上，有一对盖罐静静安放其间，罐体大小、颜色和整个书架非常协调，时常会被观众忽略，但若仔细观察则忽觉眼前一亮，十分精美。

两个罐体呈圆柱形，有钮盖，通高30厘米，足径15厘米，罐体轻盈，内部刷有锡粉。罐体外部颜色以黑、红为主，另有金、棕黄色相缀；一罐绘有姿态各异的花卉，一罐尽是饱满诱人的浆果。绘画者的技艺高超，整幅画面聚散疏密运用得当，以花卉罐为例：有的花独一支，也有三两支聚为一簇，顾盼生情，相互呼应，让整体画面活泼起来。其圆柱结构让观者在旋转柱体时，看到的是一幅紧凑、无中断的动态花卉图，较平面绘画更有意犹未尽之感。从细节看，花卉形态不一，层次丰富；从整体看，整个罐体优雅大方。

这两只罐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是装饰品还是实用品？它们是宋庆龄买的，还是别人赠送的？它们是哪里生产的？

带着疑问，笔者展开了一些考证。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看罐底的商标。两个盖罐的罐底确实存在商标，但模糊不清，大部分字母已无法辨识。所幸在花卉图案盖罐的内部还有一些器皿，取出后，发现有木勺两把，无盖小罐两个，烟灰缸一个，盒两个和小钮盖罐一个，证明这对罐子应该属于实用器具。所有物件上的纹饰均为花卉图案，花卉的刻画和大的罐体类似，风格完全一致。最重要的是笔者在里面几个小物件的底部，拍到了更为清晰的商标。

在费尽周折破解了这个商标之后，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整个印最上方是英语印章的意思（steal），中间是商标图案，一只鸟蹲在一个靴子上；商标的下方是俄语 Семенов，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也是这套工艺品的产地；商标的两侧是俄语 Хохломская роспись，翻译成中文意为霍赫洛玛装饰画，这是俄罗斯特有的绘画艺



▲ 霍赫洛玛草莓图案盖罐



▲ 霍赫洛玛花卉图案盖罐



▲ 罐顶浆果图案



▲ 罐顶花卉图案



▲ 花卉图案盖罐内存放的器皿

术，用此类艺术创作出来的工艺品，在俄罗斯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做霍赫洛玛装饰画木器。

俄罗斯装饰艺术“霍赫洛玛”是一种俄罗斯木画工艺品，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以其生动的花朵图案而知名。它的关键设计元素为鲜艳的花卉和浆果；此装饰品通常以木材制成，器型多为桌面上使用的物品，在黑色底面上以金、红为主色作画。创作完毕后，这些木质的艺术品感觉上更加沉稳，外观充满金属感。

探寻至此，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这对罐子就是霍赫洛玛装饰画木器，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生活实用器具。

制作霍赫洛玛装饰画木器的步骤通

常是刻好木器，用粘土装填在刻制好的器皿里，而后在器皿表面绘制好花卉等图案，接着用生亚麻籽油涂抹于容器表面，再用锡粉刷匀内壁，最后放在窑里用较高的温度使表面烘干硬化。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霍赫洛玛装饰画木器和其他俄罗斯漆器最大的不同：一般的俄罗斯漆器最后的工序是用清漆涂抹，这样可以最好的保护器表同时使之呈现光泽；但是霍赫洛玛装饰画木器使用的是生亚麻籽油，长时间的陈列会让外罐的色彩逐渐斑驳脱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罐体的图案有不同褪色的原因。而罐子内部存放着的物件由于密封保存的关系，颜色保存得较好，比主罐体颜色丰富，也更为鲜艳。

那么这对霍赫洛玛盖罐到底是宋庆龄所买还是友人赠送的呢？由于缺乏具体的史料记载，确实一下子难以找出确切的证据。但是从宋庆龄一生的轨迹来看，笔者倾向于是她的友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赠送。

霍赫洛玛艺术形式从17世纪后半叶兴起，发展到20世纪初时已经几近消亡，到苏联时期才重新振兴起来。20年代至30年代早期，从事霍赫洛玛手工制作的工匠们重新聚集在合作社，到了60年代时，苏联建成了霍赫洛玛的画师工厂，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业机构，形成了霍赫洛玛的生产中心。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宋庆龄都有过去苏联的经历。

追溯宋庆龄的历史动向可知：1927年宋庆龄前往苏联，当时国内的政治走向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完全背离，特别是12月国民党镇压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杀害了苏联驻广州10余名外交人员，并在当月14日下达了对苏联的断交令；17日宋庆龄致电蒋介石，警告蒋介石不要与苏联断交，否则“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决定”。1928年5月，宋庆龄抵达德国柏林，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直至1929年5月回国。9月，宋庆龄再次出国，这次她主要居住在柏林，到1931年7月回国时才途径莫斯科



▲ 小盒底部的商标

周转。在这段时间中，宋庆龄几经辗转，携带这两只罐子在身边的可能性不大，与她的心境环境都不符合。

而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两国往来频繁，合作交流都很密切。宋庆龄一直致力中苏友好，她象征着由孙中山和列宁所缔造的中国反帝民主革命同苏联之间的历史性联系。1949年，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她任副会长，1954年后任会长。多年以来，许多苏联代表团——官方的或文化界的——来华后，几乎都要去拜会她、向她致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这对苏联特色的工艺品在这个时期出现在宋庆龄在上海的家，笔者认为是最合乎情理的。

玻璃藏品复制解述

撰文 / 王克华

一、起始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展览、展示文物的方式与一般博物馆在形式、理念、效果的要求是不相同的，它是以故人生前生活气息较浓厚的温馨庭院的开放陈列来面对参观者，让观众感受到“我到她家，她就在身边”的亲切感悟。故居内的一草一木、所见物品（包含植物、鸽子，可移动和不可移动）都是文物，任何一件物品的定位摆设都展示出宋庆龄生前的生活状态。在她居住、工作的环境中留存有许多生活用品，同时还陈列着一些各国友人赠送的纪念礼品，其中有部分繁复精美的玻璃器皿。

近代故居室内文物保护与博物馆文物陈列柜保护是不同层次概念。前者需定期（短时间）清扫房屋，对室内摆设器具掸去灰尘，实现擦、理、清洗等人工护理，这必然会使文物损伤概率增大。而博物馆内文物是展放在密闭恒温恒湿的陈列柜，以保安为主。由于玻璃器皿

的损坏是不能修复复原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贯彻落实国家《文物保护法》以保护文物为主原则，对故居展示的部分玻璃文物实施复制与修复，笔者有幸承担了此项工作。其中修复复制的文物包括主楼一楼餐厅中的一件荷花型绿色玻璃插盆，客厅茶几摆放的一件褐红色玻璃立雕插盆，二楼卧室梳妆桌两旁展示的两件水晶玻璃花瓶和办公室书桌上的一件圆十边形水晶玻璃花瓶。复制时发现荷花型玻璃插盆的插花件底部有裂痕和局部损伤，由于玻璃器皿的损坏是无法完全复原的，因此对展出的这几件易损、易伤、易污材质的文物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复制保护措施。

二、藏品叙证

五件文物都属玻璃日用艺术品（工艺品），在宋庆龄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无法查阅到其来源。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存放着众多的玻璃藏品，而这五件文物



▲ 水晶玻璃花瓶（1）

▲ 水晶玻璃花瓶（2）

▲ 水晶玻璃花瓶（3）



▲ 褐红色玻璃插花盆

▲ 荷花型绿色玻璃插花盆

摆放客厅和主卧显要的位置（从纪念馆成立至今），可以推测宋庆龄生前由衷地喜爱这五件物品。

五件玻璃器皿可分为两个类型：水晶玻璃花瓶和彩色玻璃花卉插盆，从材质起源和形状、雕刻内容叙证：

1. 水晶玻璃

三件花瓶同属于捷克水晶玻璃花瓶，它不属于天然水晶，而是捷克的一种强化玻璃工艺技术。其工艺是在制造玻璃

的工艺技术上加上了强化压缩的技术，产品出来后有一种水晶的质感，所以称为捷克水晶。

全球把水晶玻璃桂冠赋予捷克，是因从18世纪始捷克波西米亚人利用本国北部劳济慈山上丰富纯净的石英山脉和作为燃料的橡木、山毛榉森林找到了改良制作玻璃的方法。这些木材燃烧后含有大量碳酸钾草木灰，添加于玻璃熔炼之中，玻璃更为纯净透亮。通过波西米



▲ 水晶玻璃花瓶（1）底部的太阳花图案

亚人几百年不懈努力，玻璃制作工艺日渐精良，生产出的玻璃器皿质地上乘、声誉极好，使它在各国宫廷教堂和新兴市民阶层备受青睐，被称为“波西米亚水晶”。波西米亚水晶玻璃产品上的“太阳花”纹饰被公认为是捷克水晶玻璃在全球的注册商标。

水晶玻璃花瓶（1）上口略有向外，外形整体呈显弧面曲线。外部雕刻于花瓶整体分三组合，瓶底部反面刻有“太阳花”纹饰，如解释为商标，这件花瓶可归纳为捷克波西米亚水晶制品；水晶玻璃花瓶（2）口部略向外翻，壁外最上层方形端面有圆弧曲线；水晶玻璃花瓶（3）显上大下小圆锥体，外形整体雕刻几何方形块面。

三件玻璃花瓶由夏氏琉璃坊检测折射率均为 1.48 左右，该数据说明三件花瓶是含铅 24% 的玻璃（即铅水晶玻璃）。从花瓶使用时间推论三件水晶玻璃花瓶

均来源于欧洲。三件花瓶外置的纹饰都以几何块面状呈现，在光的照射下每块端面都会闪烁出五彩缤纷的晶莹亮点。

2. 彩色玻璃

故居保存的两件玻璃花插属于彩色玻璃质地。14 世纪罗马人在制造彩色平板玻璃采用了冠冕法，在坩埚窑熔化不同金属元素，制成各种彩色玻璃。

（1）荷花型绿色玻璃插花盆是用半透明的浅绿色玻璃制作，内壁光滑，外壁磨砂并以透视画法刻磨荷花花瓣与叶筋脉。插花盆内小外大呈喇叭形状，反面分 12 块面，沿盆形状雕刻内凹圆弧状，正面整体感观 12 片荷花叶环状。莲蓬的玻璃以写实雕制，上部呈半球形，分别有 18 个孔径 1cm 的插花孔。盆的托座巧妙利用视觉感官用黑釉陶瓷制作。整件作品如果在较暗的室内用一束光照射时，人们的面前会出现一朵荷花仿佛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飘浮在空中，而看不清托座，更加突出了荷花坚贞纯白、出污泥而不染的特色。托座外形分四层，从上而下圆周伸大，有最底层高 2cm，宽 7.5cm 的三个支撑脚。盆托的反面底部有英国制造的英文标识。

（2）褐红色玻璃插花盆用褐红色玻璃制作，盆背面和仕女立雕表面处理亚光效果呈现半透明状。人形立体雕塑突出写实造诣的功底、融合自然界的艺术理念。盆上沿部分由内向外翻，呈现喇叭形。内壁光洁，外壁浅浮雕；视感圆周内壁由三朵花卉（五瓣花、花蕾、六

瓣花)组成一组,有三组。每朵花卉中间有浅刻1cm宽的叶筋脉相隔。底部有六叶花以及数片花叶。花枝杆式的三个脚(高2cm)分布在每组花卉之间作为盆的支撑点。20世纪初、中期这一类作品(制品)在亚洲地区,从设计造诣,制造工艺、机械设备和作品艺术表现力度都无法与欧洲抗衡,笔者倾向认为这些玻璃制品来源欧洲较为确实,所以盆壁是用浅浮雕玻璃透视法完成刻画的三组花卉纹饰和底部花卉(五瓣花、花蕾、六瓣花)按欧洲植物花卉考解。

五花瓣可能为原产欧洲地中海的紫罗兰(Matthiolaincan),这种花深受欧洲各国人民爱戴,花语为永恒的美丽。古希腊把它看做富饶多广的象征,雅典城则用它作徽章、旗帜的标记;六花瓣可能为原产中国的百合花(Lilium),寓意百年好合、百事合意的吉兆。12世纪时智利、法国曾把该花作为国徽的图案;花蕾可能为原产波斯的玫瑰花苞(Rosa rugosa),长久以来象征着美丽与爱情。古希腊把它象征爱神阿弗洛狄忒(Aphrodite)、维纳斯(Venus)。现实生活中含苞欲放的玫瑰是送最亲爱的人最好礼物。

三、复制程序

用硫化橡胶(Vulcanized Rubber)制作模具,翻制石膏(model gypsum)实样,根据需制作材料的收缩率对石膏实样放大,再用耐高温模型材料制作模具。

A. 水晶玻璃:熔炼含铅24%玻璃白料。熔炼套模具吹制或机吹,热形定位,保温至逐渐冷却。切割、打磨、修正、抛光。打磨、抛光设备均为自制。

B. 彩色玻璃:熔炼两种彩色玻璃料,采用失腊浇注法(现琉璃制作法),保温至逐渐冷却。切割、打磨、修正、抛光。其中玻璃莲蓬打孔难度较高。

传统玻璃制造工艺工作环境较艰苦,空气污染严重,操作亦在高温环境下,有些已被社会发展淘汰,至今掌握这些手工制作工艺的技术人员也不多了。现在虽然可借助许多先进的精密仪器设备,但复制作品必须保留原文物外在留沉该年代应有的韵味和痕迹,难度越来越大。

四、结语

对易损、易坏、易污染、不易修复、不易保存的文物来说,复制工艺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必要措施。像上海宋庆龄故居采用开放式的陈列方式,会加大文物损伤的风险。利用复制品替代文物陈列是文物保护工作中最有效直接的方法,它可以消除对文物的损伤,延长文物的寿命,并替代文物传递历史的信息。近代文物的种类繁多,涉及的工艺制法多种多样,所需材质也极为复杂,加上有些复制工艺的传承越来越少,笔者建议对易损文物尽可能地早做复制,把对文物造成损坏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文博馆员)

浅谈故居香樟树煤污病的防治

撰文 / 徐世伟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坐落于城市中心，院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绿化覆盖率极高，拥有徐汇区乃至整个上海市都为数不多的古树名木群。故居院内有三十多棵百年香樟树，成为故居一景。如何管理好这些“活的文物”是故居绿化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而每年对香樟树煤污病的防治工作则是“重中之重”。

煤污病又称煤烟病，在花木上发生普遍，影响光合作用、降低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甚至引起植株死亡。其症状是在叶面、枝梢上形成黑色小霉斑，后扩大连片，使整个叶面、嫩梢上布满黑霉层。

上海地处长江之尾，年平均气温 15.7°C ，年平均雨量1178.2毫米，气候湿润，雨量较多，尤其每年6、7月之间的黄梅天，更是湿热难耐。故居内湿热的小环境给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故居内的香樟树树龄大多在百年左右，树冠较大，加之当初栽植较密，树



▲ 香樟煤污病发病严重的植株

与树之间的间距较小，后花园遮天蔽日，下雨及其他自然现象形成的水汽很难挥发出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潮湿的小环境，使得香樟树通风透光达不到要求，大多香樟树树体存在相当数量的青苔就是很好的佐证，这样的条件非常适合煤污病致病病原菌的形成和生长。另一方面，故居周围的别墅和住宅区也种植着相当数量的高大香樟树，同样的生长环境也导致了煤污病的相互传染。

另外树体周围土壤密实度过高也是煤污病高发的原因。故居香樟树周围大

多种植吉祥草，这种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抗病虫害能力强，这些优点使其成为现在上海比较流行的地被植物品种，但其生长速度过快，直接导致了故居种植的吉祥草过多、过密，从而抑制香樟根部的呼吸，加之香樟树龄较长，根系较多，使得土壤板结，土壤的营养指数和理化性质下降。还有故居香樟的树龄较长，树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减弱。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香樟树在长期的生长过程中树势衰弱，抗病虫的能力减弱。

煤污病的发生、发展还与刺吸性害虫的危害密切相关。导致故居香樟煤污病的一大原因还在于介壳虫的存在。煤污病的病菌是以介壳虫的分泌物为基质生长的，介壳虫是多食性昆虫，寄主植物范围很大，而我馆花园内种植的植物有相当一部分是介壳虫的寄主植物，一旦介壳虫在这些植物上大量繁殖，也会导致煤污病致病菌的产生，所以，要治理煤污病必须先治理介壳虫。

我馆香樟树的煤污病发生比较严重，必须加以控制。故居的香樟多为百年古树，树身高、树冠大、树龄长，经常修剪十分困难。我们与徐汇区园林管理署的专家共同协商，制定了以药物防治为主，物理防治为辅的煤污病防治措施。

药物防治主要使用花葆与吡虫啉混用，加上甲基托布津混配的喷洒方法。吡虫啉 1000 倍药液和花葆 80-100 倍液混合，喷洒香樟树的叶面、枝条，喷洒均匀可以起到杀虫去病、洗净叶片的效果。



▲ 煤污病发生严重的树枝上，有密密麻麻的介壳虫



▲ 发生介壳虫较轻的香樟植株

果。甲基托布津是一种广谱性内吸低毒杀菌剂，可以防治香樟叶面的霉菌。施药时间为每年 4-5 月份，若虫刚孵化还未形成蚧壳之前施药。吡虫啉、花葆与甲基托布津混用起到既杀虫又杀煤污菌的作用。故居通过这种方法灭虫治病，已有效地把香樟树的煤污病控制在较轻的程度内。

煤污病是香樟四大病虫害之一，也是我馆百年香樟的主要病虫害。如何合理、有效地防治香樟煤污病是我馆绿化管理工作的重要课题，笔者相信，通过不断的探索，我们一定可以使故居香樟的煤污病得到更好地控制，为故居营造轻松怡人的参观环境。

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积极谋划2014年工作

——金晓春馆长在2014年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为公众与社会服务已成为当今纪念馆的基本任务。在新形势下，纪念馆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利用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服务于社会，更多地利用文物固有的文化魅力，利用纪念馆的文化手段去吸引观众，满足观众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纪念馆的教育目的，是当前摆在纪念馆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单位，尤其关注的是国家对于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政策。全会提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等政策。我们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要深入领会其精神，把握好当前的发展机遇，不断更新工作理念，努力增强服务能力。

第一、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心之一，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宣传阵地。为此，我们应从立足历史的真实性，加强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搜集整理、加强历史资料和文物的研究以及探讨，将纪念馆打造成对公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通过举办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临时展览、流动巡回展览以及利用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从这些方面来思考我们今后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达到我们的教育功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第二、纪念馆也是文物藏品的收藏保管机构，这决定了它对文物藏品负有整理研究、科学保护和管理以及提供使用的重要任务。藏品是博物馆、纪念馆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保护、研究和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因此，当下对于文物藏品的保护，我们要结合全国可移



▲ 2014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务虚会

动文物普查工作的契机，努力做好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包括库房的管理工作，因为是新搬库房，工作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新型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将对工作人员提出新的挑战，我们只有不断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使文物藏品得到有效的保护。对于我馆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首先就是要制定保护规划，并按照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实施保护工作。

第三，作为4A级旅游景区，如何来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我们必须以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在精品意识的指导下，通过各种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展览、主题活动，以及舒适的参观环境，最具人性

化的服务设施，为观众提供最具吸引力的文化休闲场所。我们的展示及活动必须能够引起大众的兴趣，吸引观众驻足在纪念馆的文物之美、建筑之美、环境之美、氛围之美当中，使观众获得从耳目到心灵的审美愉悦。换句话说，在纪念馆的参观中领略历史文化精粹，同时得到美的享受，这样势必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我们故居。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充分挖掘馆藏资源，积极开展文化产品开发，扩大对外宣传效果，进一步发挥我馆在推进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电子商务在纪念品销售过程中的初体验

撰文 / 许毅捷

两年前，阿里巴巴之父马云和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打了个赌，马云认为20年后，电子商务的市场份额将超越传统的实体经济。不论这个赌打得是否严肃认真，20年后是否会兑现这1亿的赌注，但近年来，网购的活跃、“双十一”的销售奇迹，还是与实体经济的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电子商务异军突起的形势下，实体经济一枝独大的局面正被打破，虽说实体经济因其及时性、具体性等特点决定了无法被完全取代，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子商务正在渐渐改变着人们的购买习惯与生活方式。笔者根据我馆纪念品现状以及开展过几次电商合作的经验，归纳了一些关于电子商务运用的想法，希望对以后该项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利用网络寻找供货商

我馆目前在售的纪念品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售卖定制的特色纪念品；另一种是购销的雨具、饮料、地图等便民物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两种商品在供货商的选择上都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在寻找定制纪念品供货商的过程中，

可以利用网络寻找合适的供货商，以降低定制特色纪念品的成本。在我馆的纪念品当中，有部分不是直接来自于工厂，而是通过礼品公司供货，导致这些商品的成本价已经接近同类商品的零售价，商品在价格上没有竞争力，导致商品滞销，从而造成库存积压以及仓储、人力等各项资源的浪费。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寻找“上游”供货商，举例而言，之前我馆通过礼品公司制作某款纪念品成本价是8元，直接从厂家定制同款纪念品的成本价就降到了3.5元，直接的影响是该款纪念品的零售价下调了50%，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该款纪念品也成为我馆的畅销款。如此的供货商调整是成功的，也为解决进货成本高的问题指明了方向。然而，与厂家的直接接洽同样存在着问题，产品种类的限制性。也许之前找一家礼品公司合作，可以制作金属类、塑胶类、棉织品类等多种材质的纪念品，现在找到一家厂家只能做比较单一质地的产品，想要不同品种还需要寻找不同的厂家，相当于将原来礼品公司干的活移植到我们这边，工作量明

显增加。不过如今网络的运用大大提升了供货商的搜索范围和对接的成功率。

另外，在便民物资的采购方面，我们已经尝试购买了一批一次性雨披，价廉物美，很受欢迎。同时，电子商务的另一个优势在于“送货上门”，较之前的采购模式省去了来回的运输费用、能耗以及人力投入。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网上进货所存在的风险，比如无法直观地确定货物的质量，物流的速度难以掌控等。所以，在货品质量方面还是要多比较，选择信誉好的商家，降低后期退换货造成的不便。另外，还要随时注意库存量，及时补货，急需的货物尽量选择实体交易。

利用网络开展线上销售

一次，有一位西安的游客前来我馆参观，并购买了一些纪念品带回家，回家后又致电来馆，希望再买一些。后来通过快递和邮政汇款，解决了这位西安游客的问题。此后，笔者一直在想，如果我馆在本馆网站上推出线上购物的内容，是不是可以满足类似游客的需求呢？随后，咨询了网络运维商，得知如要达到这一要求，还需要植入一系列的模块，需要一些资金的投入。但考虑到本馆网站的浏览量并不是很高，若是将在线销售平台置于官网上，可以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要，但宣传影响面不是很大，若是将销售平台置于“淘宝网”上，那潜在的消费群就扩大了很多倍，而且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只要在官网上做一

个链接就可以了。那就是从一个单纯的销售平台转变为销售、宣传平台了，除了销售实体的纪念品还可以将各类巡展、宣讲挂在网上，需要的客户就可以点击购买，因为淘宝商品的售价不能为“0”，那么就可以借鉴前人的案例，将售价定为0.01元，之后每场巡展、宣讲产生的收益用于公益事业，这也符合我馆一直以来的办馆宗旨。

以上也只是笔者对于线上销售的一个概念，因为实际的操作还面临着更为具体的问题，比如支付手段的确定、运输方式的确定以及相关客服人员的投入等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由于这些具体因素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目前还不是大规模开展线上销售的良好时机，可以选择分步骤来开展，第一步可以尝试线上订票、现场付款，线上预订巡展、宣讲等不牵涉支付及发货的项目；再来可以尝试收取小额款项纳入公益基金；最后再是完整的从接单到发货的电子商务过程。

电子商务这个新名词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却已经悄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运用网络进行交易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伴随着在大街小巷穿梭着的快递员的身影，铁老大也步入了网上实名制售票的时代，一年一度的“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也采取了网上捐款模式。在这个趋势下，我们已经被改变，如何把握好这个契机又将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对此提出一点想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

选译（连载）

译文 / 宫洁菁

36

蒋夫人的正式访美之行从1943年2月17日开始，当天她抵达华盛顿火车站，随行的有她的侄女和侄子，珍妮特·孔、大卫·孔，还有护士、秘书、四个记者，一共25人。大卫当时是哈佛的学生，没有像18岁的珍妮特一样引起那么多的评论，珍妮特的“中式长衫和男式发型”使得某些记者戏称她“样子有趣”。到火车站迎接的有罗斯福夫人、宋子文夫人、中国驻美大使及大使夫人、还有中国大使馆的一众官员。美龄穿着一件貂皮外套，里面是黑底红花套裙，搭配一条亮片装饰的围巾，作为她在这个国家首都的第一次亮相。被迎进会客室后，她与埃莉诺·罗斯福互相拥抱，然后被带去会见总统，总统在车站外白宫的专车内等待。

罗斯福事先就被告知美龄的魅力是声名远播的，他下决心不被“勾引”（一个他最喜欢的单词）。通常他坐在沙发

上，他尊贵的客人坐在他身旁，但是在总统办公室进行第一次会谈时，他在两个人中间放了一张牌桌，他向他的女儿安娜解释说因为他不想离她“太近”。蒋夫人并不介意他的不安，还邀请他和其他官员跟随她一起回中国。一次私下会谈时，罗斯福问她威尔基访华的情况。她回答说中国很欢迎他。

“您到底是怎么评价温德尔·威尔基的呢？”他继续追问。对于坊间流传的闲话，总统可能颇感兴趣。

“噢，他很有魅力，”美龄回答。

“啊，是的，但是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罗斯福再次询问。

“好吧，总统先生，不管怎样，他还很稚嫩。”

“好吧，蒋夫人，所以您认为温德尔·威尔基很稚嫩——那么我呢？”

“啊，总统先生，”她回答，“您很老道。”

尽管美龄试着去吸引他，但还是没



▲ 宋美龄抵达华盛顿时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欢迎

能让这位总统作出输送大量战争资源给中国的承诺。据一个中国记者所说，夫人显然很不开心：“一些仆人……感觉到了她的失望，还有一些不理解她的无理和势利。当然，蒋夫人在白宫是孤独的，罗斯福夫人离开了，罗斯福总统不常去看她，只是在碰巧见到她的时候打个招呼。”

观察者还注意到，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私人的或政治性的，在访美期间美龄避免与宋子文一起开会或是有密切的接触，宋子文回了中国，在美龄抵达华盛顿后12天又过来了，像是为了帮助她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援助。这个猜测因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当然赞同她妹妹对于武器和飞机的需求而得到了

证实。“如果说她对于我们从租界法案获得的东西很满意，”他说，“那么我就是在说谎。”

如果说美龄那无与伦比的魅力在总统身上没起作用，那么在美国国会就是大放光彩了。她深入人心和最引人注目的出场是抵达后的第二天，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她是受邀发表演说的第一个普通市民和第二个妇女，当天她在穿着上很谨慎，一身黑色旗袍，亮片装饰，搭配玉质首饰。她从参议院中央长廊的绿色地毯上走下来，在讲台前坐下，边上是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引起了一阵轰动。她告诉议员们她没有准备要演讲，不是“一个很好的即兴演说者，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演说者，”但是刚才却被华莱士邀请对整个议院发表演讲。使听众充分卸下防备后，她开始讲故事，詹姆士·杜利特尔将军的一个飞行员在东京执行完一次轰炸任务返回时，在中国境内跳了伞。当他着陆并看到中国人向他跑来时，他便挥手喊着他会说的中国话——“美-国，”既是“美利坚合众国”又是“美丽的国度”的意思。蒋夫人说，中国人笑着，“像看到了一个失散已久的兄弟一样欢迎他……他……告诉我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时就像回到家了一样；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

说明她自己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这次也像回家了一样之后，她又讲了个故事，一个小猴子进了一个佛教寺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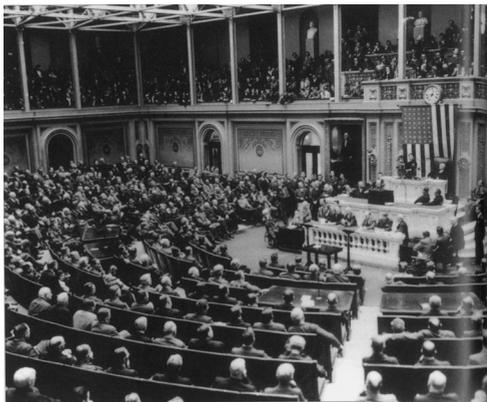
它在那里盘腿而坐，日复一日，双手合十反复祷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它发现这个寺庙的住持整天什么也不干就坐着，用一块砖擦石头，它最终鼓起勇气问住持在干什么。“我要把这块砖弄成一面镜子。”

“但是要从这块砖里弄出面镜子是不可能的，住持。”

“是的，”老人回答，“跟你整天什么也不做只念‘阿弥陀佛’就想获得恩泽一样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朋友们，”她继续，“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理想并对外宣称我们有理想，还要用行动去贯彻它。对于你们，参议院的先生们，还有你们，旁听席的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没有我们的主动帮助，我们的领导不能实现这些理想。是否从‘擦出镜子’这个故事里吸取教训的主动权在于你们和我。我感谢你们，”她说，结束了她的“即兴”演说，她得到了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埃莉诺·罗斯福陪同蒋夫人坐车离开白宫，并在参议院旁听席聆听了演讲。她说蒋夫人“是使妇女得到世界认可的一个重要人物，她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服务在世界舞台赢得了一席之地，不仅仅只是一个妻子的角色……而是她的人民的代表……当我看到她从长廊走下来的时候，她周围簇拥着的男人们似乎遮住了她的光芒。我禁不住为她作为一个妇女所作出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是当开口讲话时她就不再只是一个妇女



▲ 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说

了。她是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以她个人在世界战场前线所进行的辉煌战斗而得到了认可。”

蒋夫人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讲——“即兴的”抑或是预先准备好的——是接下来一系列巨大成功的序幕。她语速缓慢，语调从容，不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那样抑扬顿挫，她的嗓音很美，容易博得关注和尊重。而且，她能选择合适的寓言或战争故事，并在最恰当的时候引用。她的影响力，听起来是自然而不刻意的，这是必须要仔细学习研究的。如果要从形式和内容上分析她的演说，那么很显然她说得要比写得好。这在她的下一个演说中更明显——听众是议院代表——她太聪慧以至于没有人发现她是在迎合听众。她是一个被夸大的公众演讲者，据杜鲁门所说，“引起了自从林德博格横跨大西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洪水般的崇拜和欢迎。”

几分钟后，在议院发言人是萨姆·

雷伯恩和其他杰出男伴的陪同下，她进入议院，走上发言者讲台。“一个小小的，纤瘦的身影，穿着中式服装，走下长廊，旁边都是身材高大的男士，她的亮相激动人心。她自己知道这一点，她对此有着敏锐的觉察力。”罗斯福夫人说。“她穿着紧身黑色长旗袍，开叉几乎到了膝盖的地方”《曼彻斯特卫报》的约翰·吉廷斯说。当议院发言人萨姆·雷伯恩介绍她的时候，据记载她访美之行的官方书籍所述，“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几天前，蒋发给他妻子五个要点，要求她在这次非常重要的演说中进行强调。“我收到了所有你发给我的电报，”她回电报给他“……我真的很佩服和欣赏你的想法。演说……会照你的指示作，着眼于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宣布我们国家对于整个世界所作的贡献，并且阐明中国与美国友好相处的传统。”与蒋的呆板的声明不同的是，在这次对于议会代表所作的正式演说中，美龄既提到了重要的基础，又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她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现代科学已经消除了距离，以至于对一个人的影响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所有人。”她回忆了160年前“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从来没有因为不理解而被破坏。”展望未来，她用了更加华丽的辞藻，中国“有信心，书写未来的时候，美国和我们的勇敢同盟是不会因为幻想权宜的可能的理由而变得麻木的。”她对于美

国成为世界移民的庇护所的概念很有兴趣：“我遇到了……第一代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但他们现在都是美国人了……因为相同的远大目标而联合起来了。”

她的主题是宣扬民族自豪感：“你们，作为美国人的代表，面临着将你们祖先的先期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的绝佳机遇……他们经历难以置信的磨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无畏地开拓了一个新的大洲……你们今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更大的机会去贯彻这些理想，去把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类灵魂都解放出来。”说到这里她最终进入正题：“现在的主流观点似乎认为打败日本并不是那么重要，希特勒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日本侵占的地域里受他们控制的资源要比德国多……让我们不要忘记，在之前的四年半时间里，中国孤立无援地独自面对着日本的残暴侵略。”

据美龄访美的官方报道称，她演讲结束后“真正的雷鸣般的喝彩声和掌声”响起，她的演讲是广播同步的。“真该死，”一个议员说，“我从来没看到过这种场面。蒋夫人几乎让我热泪盈眶了。”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演讲，构思仔细，演讲生动。蒋夫人在国会两次出场的轰动效应可能是无可企及的。

关于她的最好的描述之一来自《时尚》杂志的艾伦·塔尔梅：“蒋夫人极

有感染力，站在讲台上一群老练的政客们旁边，她就像一把钢剑，纤细的，美丽的，目的明确的……她的心看到了目标，辨别出了攻击，然后冲上前去。”

对这位夫人的外貌还有很多别的评价。“很短时间内，蒋夫人就已经对国会了如指掌，”一个女记者说。“娇小得像个象牙小塑像一样，蒋夫人穿着她的美式高跟鞋也只不过5英尺高……她的平衡性很好，她很好地运用了她那双小小的，表达丰富的手。就像她的思维一样，她的行动迅速并且优雅。”《德梅因纪事报》的记者没有那么激动，注意到了夫人那套“合身的”裙子，密苏里州一个自以为是的记者给她冠以“可爱的东方人”的头衔。总之，她把她的娇小，女性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对那些能帮助她和她的国家的高大的，基本都是男性的美国国会议员而言，很有吸引力，而且，因为她生长在美国，所以她使用的是她精通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对于蒋夫人所使用的深奥的历史典故和生僻字有着各式各样的评论。“蒋夫人使用的‘Gobineau’和‘Obtunded’使新闻记者很困惑，”一个标题写道。查了韦氏字典记者们才明白“Obtund”是指“无聊”“迟钝”或者“压制”。谈论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日本，夫人说：“世界开始认为日本人是尼采所倡导的‘超人’，智力和体力都很优秀——古皮诺和豪斯顿·张伯伦，还有他们的聪颖的学生们，纳粹种族歧视者，坚信北

欧人有这些特质。这句话迫使记者们冲到他们的百科全书前查询谁是古皮诺，十九世纪一个法国外交家，他宣称只有白种人可以创造文化，还有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写了本宣扬德国人是优等民族的书。

在全国出版的很多正面报道中，《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是最有代表性的：

“众议院对蒋夫人的到来所表现出的异常热烈的欢迎，以及对她所做演讲的口口相传——不管怎样，是出于对于一个伟大人物的称颂。战争时期她所表现出的勇敢、智慧、尊严，还有她的魅力，已经赢得了所有美国人的钦佩……大家都将记住，蒋夫人保持着独特的尊严，没有抱怨什么，也没有索取什么——除了为我们大家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和一个安全的未来。

……

蒋夫人在华盛顿的其他活动则是VIP客人的一些寻常职责：在无名战士的墓前敬献花圈，弗农山庄之行，华人欢迎大会，总统茶会。但是，她在首都的仪态很快就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主要人物面前。中国的首位世界外交家顾维钧在他的日记中写，尽管大元帅夫人是罗斯福白宫的客人，但她在招待共和党政客时没有丝毫犹豫：“乔·肯尼迪、J·法利先生、温德尔·威尔基，都见过她好几次……他们全都是反对总统的……总统显然很不安，罗斯福夫人提议让她住海德公园，这样她可能会更舒服些。”



▲ 宋美龄和罗斯福夫人在白宫草坪前合影

还有一件违反规矩的事，夫人告诉顾她尽力不让她的东道主看她的讲话稿，虽然“他们示意在发表之前要让他们先审查一遍。”更糟糕的是，在讲稿中她完全没有提到总统。罗斯福总统越来越不信任美龄，觉得她跟她向世人展现的形象很不一致，尽管他夫人一开始挺喜欢他们的这位客人，但自从他们的客人从医院出来，她的态度转变了。

据埃莉诺·罗斯福叙述：

蒋夫人在白宫期间，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跟她谈话的男人们的反应让我觉得很可笑。他们觉得她可爱，有智慧，也很迷人，但他们有点儿怕她，因为当她为中国为她丈夫的政权而战时，她就是一个头脑冷静的政治家；柔弱的手臂，低沉、温和的嗓音掩饰了她钢铁般的决心。在和男人谈话时，她有时会流露出对于残暴行为的不经意，但和我从来没有过。我向富兰克林描绘了一个甜美、温和、引人怜爱的形象，他却发现了这个女

士的另一面，这让他一度以取笑我缺乏观察力为乐。我还记得一次晚宴上发生的事情……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娱乐。约翰·L·路易斯当时正在采取行动，富兰克林问蒋夫人：“在中国你们怎么对待像约翰·路易斯那样的工人领袖？”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她那美丽而小巧的手在她的喉咙前划了一下……富兰克林望着我，确定我没有听错……事后他就开我玩笑：“怎么样，你那温和甜美的可人儿怎么样？”

美龄傲慢的表现，使得白宫的工作人员很难过。尽管她在白宫的房间里安有电铃和电话，但当她有需要时，她还总是走到门口击掌来传唤白宫的仆人。这是她在中国家里的习惯，但在白宫是非常不合适的。不仅美龄，连她的侄子侄女也要得到最高规格的招待，珍妮特吵闹着抱怨白宫的服务太差。据埃莉诺·罗斯福所说，孔家的孩子“认为我们把所有中国人都当成洗衣工，看不起他们，他们急于摆脱这种想法。他们有时看上去怀着根深蒂固的不满。”不是每个人的评论都这么仁慈。中国的公使们宣称孔家的孩子“损坏了中国在美国政坛的声望。”

50

五、六年之后，大元帅的妻子写下了她为什么决定“回去跟台湾的丈夫、人民一起共同接受命运的安排”，尽管朋友和家人都尽力“劝阻”她这么做：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我一直祈祷……

我一次又一次问我姐姐，孔夫人，“上帝怎么可以允许如此罪恶的事情发生？他怎么能让共产党占领大陆了呢？他不知道他们是他的敌人吗？”她会回答，“继续祈祷吧，耐心一些。我确定他会为我们找到一条路的。”然后有一天黎明时分，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我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如神灵般的声音清晰地说：“所有一切都是对的。”这句话使我惊醒，我立刻起来走到姐姐的房间……在我张口之前，她坐起来，说：“发生什么了？你看起来容光焕发。”我告诉她我听见上帝跟我讲话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好在我姐姐明白我的意思。当我宣布我要乘第一班飞机回家的时候，她帮我整理行李。她没有再反对。

在美逗留期间，大元帅夫人没有发表演讲，也拒绝见记者。她的沉默使得她通过NBC发布的15分钟告别演说更加戏剧性。1950年1月8日中午，她在孔府的客厅发表演说。她说她要“回到她台湾岛的人民中去，那里是希望的堡垒，是我们对抗蹂躏国土的外敌的战争要塞。”二十多年来，她说，她的丈夫“领导人民与共产党作战……蒋介石，是所有国家元首中第一个察觉共产党的背信弃义的人……几年前，他受到赞颂，因为他发起战争的勇气和坚韧。而现在他却受到了攻击。时代变了，但人没有变。我丈夫还是这么坚定。”蒋夫人说，中国现在“被遗弃了，孤独的”站着，肩上只扛了“一把捍卫自由的枪”。她说

她很骄傲，不会再向美国人民企求帮助。

“当一个国家，就像人一样，做出一个正义的举动，”她说，“那一定是他的良心使然，而不是因为别人的请求和需要。”

美国政府不再为蒋夫人提供回家的交通工具——华盛顿要求中国政府支付她乘坐美国海军运输飞机离开中国的费用——夫人抵达旧金山的时候看上去“又累又苍白”。在旧金山停留后，她搭乘飞机去夏威夷，她在皇家夏威夷饭店休息后又去了檀香山。然后她和她的随从去关岛、马尼拉，最后抵达台湾。据一名记者说，经过一年的分离，她和蒋见面后只是以一次“简短的握手”相互问候。

蒋氏夫妇有一段时间没有住在一起，但后来美龄还是搬进了丈夫位于士林的官邸，士林是台北市郊外的一个村子。官邸是7年前建造的，西式风格，与一个公园毗邻，不在主干道上。这是一幢朴素的单层花岗岩建筑，它让蒋氏夫妇过上了一种远比在大陆时平静的生活——那是蒋所享受的一种虚假的简单，美龄则是为了对外形象而忍受着。而且，他们现在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很少有个人仇恨或业余活动的空间。夫妇俩最后建造了一个小教堂，美龄带动他们的朋友和来访者一起参加里面的活动。

夏天，蒋氏夫妇搬到草山行馆去住，这个别墅是台湾糖公司建造的，当时为了招待来访的日本皇室王子。在山上很高的地方，他们夏天从台北市中心过来



▲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花园留影

只要 20 分钟。这房子最大的优点显然是它的视野；建造在一座小山边，向外望去能看到花园以南和以西好几英里。前门里面，参观者进入的据说是一个“怪房间”，大概 20 到 30 英尺。房间里有四根方形柱子；中间是一个 18 人座饭桌，配有加厚软垫的椅子。墙壁——下面是灰色的，上面是淡绿色的。房间周围摆着放有盆栽的桌子——杜鹃花和兰花，每盆植物都有一个印着拉丁名字的标签。大房间边上有四个小房间：他的书房，她的书房，一个小的会议室，以及一个私人餐厅。有四个小卧室，本来是给佣人住的，现在是秘书和助手们用，还有一个盥洗室。

搬去台湾并没有改变蒋的作息时间。拂晓就起床，7 点前做完运动，洗漱穿戴完毕，而美龄，据家庭医生说，总是在床上一直躺到 11 点，“蒋和夫人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他晚上 9 点或 10 点睡觉，早上 6 点起床，而夫人不到夜里 1、2 点是不会上床睡觉的……为了不打扰彼此，两人都轻手轻脚。”蒋早餐爱吃米饭，腌菜，白开水，看报告一直看到中午。Li 将军还在美国，大元帅承担了他的责任，他的助手从一开始的两、三个，很快增加到二十几个。他们把他要看的文件准备好，上午 9 点准时把文件夹放在他的桌子上。11 点左右，官员们陆续来开会。有些人会在那吃顿便饭，如果夫人对谈话的主题或者人感兴趣，就会一起用餐。

下午的日程，是上午的重复，蒋先睡个午觉，接着开始读报纸，继续开会。通常 4 点半的时候他会跟妻子或者助手散步，然后喝茶，继续工作，直至晚上 7 点，做祷告，用晚餐。美龄回来后就要求每天有一顿饭吃西餐，“因为，”她解释，“他吃的太快了。”西餐一次只上一道菜，这样就迫使大元帅放慢速度，美龄抵达台湾后一个月，有人采访她，她说，“他的身体好多了。”晚上还是工作，或是看电影，大元帅一天中的最后两件事一是含用有硫化物的泉水洗澡，二是写日记。

然而，美龄回来使蒋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许因为她在美国生



▲ 宋美龄与蒋介石共阅《圣经》

活了一年多，受到那些诽谤他丈夫的话的影响，又或许她意识到他面对岛上的人时是那么的冷淡和疏远，几乎刚抵达台湾，她就让他进行协商和改革。她回来一周后，《纽约时代》报道，“蒋介石夫人今天呼吁美国向台湾输送军事和技术顾问，帮助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作战，”她还强调台湾没有要求武装军队的介入。“我知道美国人不想介入战争。没人想在这里看到美国军队，中国不需要美国兵……我们有足够的人力。”“说明了这一点，”美龄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告诉美国记者，“你们的政府说和共产主义作战。我们确实在这么做。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美国军事代表团可以提供所需的技术上的帮助，例如交流，交通，电台发展……不必向真正的朋友乞求帮助。如果他们是你的朋友就没有必要。”

然后美龄着手改革。1月22日，美国新闻报道“蒋介石夫人今天下令立即进行军队工资发放情况调查，因为她听

说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没有领到薪水。”这篇文章接着解释，美龄视察了两个军队医院，跟近四百人谈话，发现他们都没有拿到薪水。其中一个士兵，在战争中失明了，他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钱了。大元帅夫人记下了他的编号，让一个助手去调查。“我一定会看着你拿到薪水的，”她向他承诺。但是尽管她很努力，台湾军队里还是存在显著的动乱，例如绝食抗议。政府下令就伙食、衣服、住处、卫生各方面展开调查，但同时也毫不手软的逮捕了一些示威者。

十天后夫人访问了金门岛，蒋在那里驻扎了国民政府的军队。“金门”意味着“金色的大门，”据《纽约时代》的一个记者所写，那是“抵挡共产党入侵台湾的金色大门。”美龄带着香烟，食物，还有给士兵提供“帮助和鼓舞”的新声明飞过去。她乘坐一架飞机，后面还有一架，第二架飞机上有16个新闻记者。岛上的人要求得到更多更好的食物，现代化的通讯设施，还有书籍。她告诉他们，大元帅对他们的供应问题有“很清醒的认识”，也很担心他们，以至于都失眠了。她说她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因为到处都在说国民政府的士兵不能打仗。“你们战斗了，而且战斗得非常英勇，”她告诉他们。就如预料的一样，当她问道“你们会继续战斗吗？”时，他们吼道“会！”

……

然而，前领导人和他夫人的到来并没有使台湾人兴奋，台湾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期待，宁愿被晾在一旁，也不想卷入冲突的中心。大元帅对街上的人仍很疏远，不管去哪里，他总是有一车队的凯迪拉克轿车护送，卫兵驻扎在路边。来台湾的最初几年，卫兵的数量增加了。

“也不全是因为有暗杀的危险……才增加的，”哈恩说，“多数在大陆为他服务的卫兵，现在有儿子或者侄子（外甥）之类的需要就业机会。”

这时，台湾的人口数量是一千万到一千一百万。大元帅的军队增加到有八十万精兵，近一千辆坦克，六百架左右飞机（有些已经废弃了），七十艘左右舰艇。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预测蒋跟他的追随者们在岛上撑不过一年。但是吸取了满洲里的教训之后，蒋很快放弃了所有领地，除了澎湖列岛，金门岛，福建沿岸的马祖岛。撤退到台湾后四个月，蒋又下令撤回海南岛上的军队。

1950年3月1日，美龄回来后六周，蒋正式连任国民政府总统。任命受美国教育的吴国祯为岛上的主席后，蒋又任命叶公超为新的外交部长，叶也是一所美国大学的毕业生。蒋手下的五个最高职位都被在美国受教育的人占据。据说夫人是台湾与美国外交关系的重要顾问，

她竭力支持有这样教育背景的人。

接下来一个月，美龄成立了她所谓的“中国妇女抵抗共产主义侵略联盟”。最后简化成“妇女联盟”，据哈恩说，这个团体是“自发性的，但没有几个国民政府官员的妻子敢不自愿参加的。”团体的目的旨在帮助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建造住房，团体得到了当地商业领导的夫人们的帮助，她们说服自己的丈夫参加捐款。成立这个团体的同时，大元帅夫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远比最初目的存在时间更长的组织，最终在岛上慈善工作的很多领域都成为一个主要因素。

爱玛·米尔斯当时的职务是美国援华医疗局的执行秘书，她1950年4月到台湾做了为期两周的访问，检查岛上的医疗和卫生保健设施。她花时间跟“很累”“忙得团团转”的美龄呆在一起。美龄请她的老朋友多留一个星期，帮她的忙。

米尔斯，曾经受训成为一名护士，显然对她在岛上看到的状况很满意。她回去的时候说，“26年前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基本上不存在医学……士兵们邋邋不堪，军营里一片混乱。这次……所有一切都整洁有序……士兵们的状态看上去很好，他们的制服很合身，他们走路昂首挺胸，好像很为自己的职业骄傲。”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陈蔚文等领导参观宋庆龄故居



6月18日，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张蔚文，浙江省总工会原副主席陈定新，浙江省宣传部原副部长董芍素等领导一行14人，前来宋庆龄故居参观。

《宋庆龄在上海》主题巡展赴各社区居委展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办的《宋庆龄在上海》主题巡展，从6月起，在天平社区各居委、静安寺街道愚谷邨居委等地进行展出。

各国驻沪总领事及商务领事官员参观宋庆龄故居



10月17日，各国驻沪总领事及商务领事官员60余人，在市商务委、区商委、区旅游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

为了感谢各驻沪总领馆在推动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徐汇区商务委组织各国驻沪领馆总领事及商务领事等官员参观考察徐汇区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景点。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接到任务后，认真组织接待工作，分批带领领事们参观宋庆龄故居、文物馆及花园等处，向他们介绍宋庆龄促进国际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和贡献。

宋庆龄故居赴四川邓小平故里举办《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



9月27日，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广安邓小平故里管理局主办、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承办的《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图片展》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隆重开幕。广安市委副书记袁险峰、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竞业、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钱奇、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董卫等领导出席了开幕仪式。本次展览共展出20余件实物和100余张图片资料，记录了宋庆龄的生平业绩、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同时也展现了宋庆龄与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长达30多年的真挚交往和深厚友谊。

宋庆龄故居赴市三女中开展“宋庆龄”主题日活动



10月21日，宋庆龄故居工作人员应邀出席了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学习宋庆龄精神 共建爱的集体”——“宋庆龄班”授旗仪式，并于当天下午在市三女中道德讲堂暨青年党校开班仪式上向高一年级270多名学生进行了《唯菊与石 品质高洁——宋庆龄的高尚品格》的主题宣讲。

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许水德先生一行参观宋庆龄故居



10月29日下午，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许水德先生一行，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唐闻生女士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市孙宋文管委巡视员匡成鸣、副主任李竞业以及宋故居纪念馆馆长金晓春等陪同参观。

许水德先生一行先后参观了宋庆龄故居、宋庆龄文物馆以及车库、花园等。参观结束时，许水德先生来到宋故居临时展厅，在签名台上挥毫题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八个大字，市孙宋文管委巡视员匡成鸣向许水德先生馈赠了纪念礼品。

许水德先生是台湾高雄市人，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曾担任台湾高雄市长、台北市长、国民党秘书长等职，著有《心理学》、《教育心理》、《青年心理学》等著作。

宋庆龄故居党支部组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局党组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部署，宋故居纪念馆党支部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较好完成了教育实践活动的各阶段性任务。整个教育实践活动分为六大方面：领导组织带头，全程践行参与；认真学习领会，夯实理论基础；广泛征求意见，找准存在问题；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门搞总结，形成长效机制；发挥辐射效应，真正取得实效。我们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全面回顾、认真分析、系统总结，使总结的过程成为认识再提高、措施再完善、工作再推进的过程，巩固活动形成的各项成果，指导今后的工作，不断释放教育实践活动的正能量，不断提升故居的接待服务质量和内部管理能力，为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弘扬革命历史，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主 编 金晓春
副主编 董 卫
策 划 麦灵芝
执 行 王宁宁

主办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18833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www.shsoong-chingling.com

内部交流